



全面廢核 解除疑慮

住房負擔沉重 基層居無可安

應對資本主義多重危機必須徵用銀行

印度與殖民地債務

羅莎·盧森堡生活和思想裏的革命民主挑戰

悼念陳鏡林

住房負擔沉重 基層居無可安

張劍

海外智庫城市改革研究院(Urban Reform Institute)與公共政策前沿中心(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發表2021年全球住房負擔水準報告《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香港已經連續第11年成為全球住房最難以負擔的城市。

Demographia 每年發表全球城市樓價負擔能力年度報告，涵蓋了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愛爾蘭、紐西蘭、新加坡、英國和美國的共 92 個城市，其中對中國僅考察了香港。根據報告，香港位列榜首，2020年香港樓價中位數指標是20.7，即相當於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數的20.7倍。換言之，香港大部分家庭需要不吃不喝近21年，才能買到房子。排在第二位的是加拿大溫哥華，樓價與家庭收入比是13倍，澳洲悉尼11.8倍，排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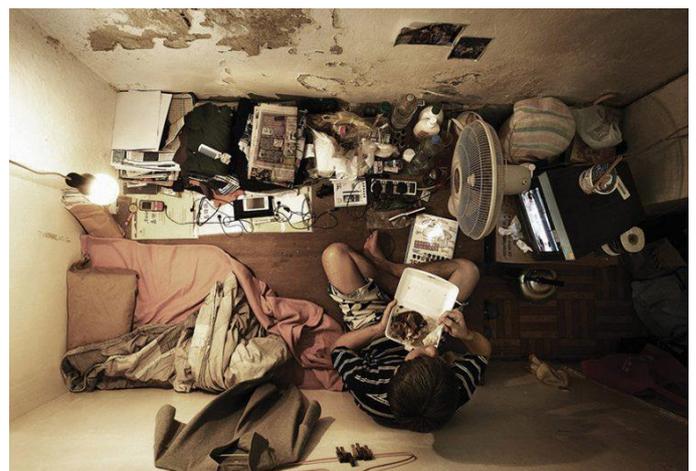
香港的房價位居全球城市前列，2019年8月香港城區均值为3.05萬美元/平，遠超倫敦的1.58萬美元/平、新加坡的1.79萬美元/平和紐約1.39萬美元/平。2019年8月香港高達50.8倍，遠超倫敦的21.9、新加坡的23.5和巴黎的21.7。

可惜，香港人的收入增幅則趕不上香港房價的漲幅。1980-2017年，香港名義房價上漲15.8倍，同期英、法、韓、美、德分別上漲9.7倍、4.0倍、3.9倍、3.6倍、0.8倍。從相對漲幅看，1993-2017年，香港房價上漲259%，居民人均收入上漲137%，房價漲幅是人均收入漲幅的1.9倍。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為提升自置居所比率而大舉推出「八萬五建屋計劃」，卻遇上1997年金融風暴及2000年科網爆破，導致大量住宅供過於求，負資產業主湧現；2002年，政府為穩定

樓市，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推出九項政策，包括不再拍賣土地、停止出售居屋、取消租務管制等，令住宅供應狂跌，總落成量由1997至2001年的平均每年8.2萬個，減少至2002至2011年的平均每年3.1萬個；2009年，又因金融海嘯後美國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導致大量熱錢流入香港並炒賣住宅物業，樓市自此瘋狂失控，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私人住宅售價指數便由2009年的121.3飆升至2011年的182.1。

2018年，香港政府統計處公佈全港劏房統計數字，按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的結果，全港約有21萬人居於9萬多個劏房內，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僅得56.5平方呎，比起公屋標準的75平方呎更低。2020年，運輸及房屋局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報告中，亦曾估算居於住環境欠佳的住戶，數目多達12.2萬個，較去年多2.4%。



單身人士居住數十呎的板間房，環境十分惡劣。（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提供）

香港行業主要集中在房地產、金融、投資、貿易領域，擠壓了其他產業的正常發展。據政府統計處數據，2017年“四大產業”就業人數為178萬人，佔香港總就業人數46.5%。香港產業結構失衡，社會財富嚴重不均，令青年倍感前景暗淡。

立法會資料研究組2020年初發布《數據透視：對青年人的房屋支援》，由2011至2019年，每年平均有約5.8萬名30歲以下年輕人申請公屋，當中有不少人在大專課程尚未畢業時便已經申請；2017年的居屋買家數據也顯示，有5.1萬名申請者年齡在30歲以下，佔所有申請者的一半，最後只有297人成功購得物業。

2011年，時任特首曾蔭權解決青年居住難題，推出青年宿舍計劃，歷經九年後，直到2020年3月，首個僅僅提供78個單位的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宿舍PH2項目才正式入伙，當中有70個面積為187至232平方呎的單人單位，每月租金為4,248至5,831港元，另有兩個面積為398平方呎的雙人單位，月租8,670至8,711港元，還有六個面積為152至189平方呎的共居單位，月租4,606至5,671港元。PH2項目合共收到約900份申請，即超額申請約10.3倍。PH2由特區政府斥資1.7億元建築費，並由香港青年協會負責營運，由於宿舍租金與市價掛鉤，即使目前已經低至市價的55%左右，但未能減低年青人的財政負擔。PH2的租戶群組年齡介乎18至31歲，而人均租金約5,040元；若以香港統計處最新資料—20至29歲的男性就業人士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為15,500元、女性則為15,000元作推算，PH2的租金約佔這個群組月入的33%，負擔不輕。

再者，青年宿舍的首次租期至少兩年，總租期合計不得超過五年，意味着五年後年輕人依然須面對高昂的居住費用。同時，根據國際顧問

機構美世（Mercer）於6月公布的2020年度《環球生活成本指數調查》，香港連續三年「榮膺」冠軍，成為全球生活物價水平最高城市。消費水平持續高企，在租金又已佔去三分之一收入的情況下，五年內實難以儲備足夠金額置業。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受社會福利署資助財政報告》，負責營辦PH2的青協每年盈餘只有30萬至500多萬不等，但差餉地租沒任何優惠，大廈維修也須全盤自理，預期三十年須花費約1,000萬元維修費（即每年約33萬元）。青協督導主任黃秀儀坦言，政府沒有提供補貼，目前PH2的租金收入僅僅足夠維持收支平衡，換言之，巨額的營運經費轉嫁為租金。

怪不得有人認為香港病人膏肓背後的五大民生“原罪”乃居無可安，少無所盼，老無所養，窮無所醫，低無所學。居無可安名列第一條原罪，實至名歸。

資料來源：

1. 孫雅靜，“香港病人膏肓背後的五大民生“原罪”，《超訊國際傳媒》，2019-03-12。
2. “三大問題致良好政策一團糟，青年宿舍無法令青年安居”，《香港01》，2020-09-15。
3. “負擔不起的樓市排名 香港蟬聯全球第一”，香港奇點財經，2021年2月28日。
4. 《長遠房屋策略》，2020年。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7卷第3期（總第249期）

2021年3月19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全面廢核 解除疑慮

破謎

亞洲通訊社社長徐靜波指出，日本福島核洩漏事故發生了10年，遲遲處理不了的根本原因，就是靠近爐底的輻射量超出了人所能夠接受的極限，也就是說，人無法靠近。同時，由於爆炸，已經把核反應爐爐底部分的架線與各種鋼架結構炸毀，即使機器人要進入爐底，首先要清除一切路障，切割原子爐，研發製造具有專業技能的機器人。另外，燃料棒沉入爐底，但是必須要不斷地使用冷卻水進行冷卻，於是每天都會產生大量的污染水。經過處理後的“核廢水”，囤積到特製的大型鋼罐中，如今，已經有1000個鋼罐，超120萬噸放射性污水，再過兩年，核電站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堆放。

勒爾的放射性物質，相當於在十年前核洩漏事故中曾發生堆芯熔毀的一二三號機組三座反應堆內放射性物質的10%。

至今，烏克蘭與日本根本無法解決切爾諾貝爾核電廠與福島核電廠兩宗特大核事故，徹底束手無策。

日本環境大臣原田義昭曾經表示，冷卻受損福島核電站反應堆所產生的核污水，目前超過100萬噸，即將沒有空間存放，故此提出建議，在別無選擇下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水。

中國不但不放棄核電，反而大力發展，沿海地區核電廠林立，怎不怵目驚心！



福島第一核電廠用來存放核廢水的大型鋼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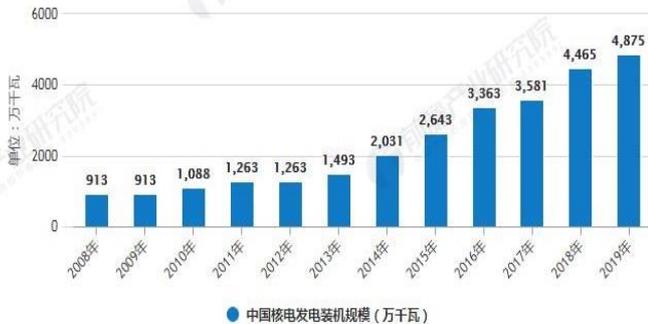
3月10日，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公佈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調查報告，在反應堆廠房上方發現嚴重污染，在位於二號機組和三號機組廠房上方被稱為“遮罩塞”的混凝土蓋子上可能共附著有7萬萬億貝克

中国大陆核电厂分布图 (截至2020年4月27日)



截至2019年底，中國運行核電機組達到47台，總裝機容量為4875萬千瓦，僅次於美國和法國，位列全球第三。

2008-2019年中国核电发电装机容量统计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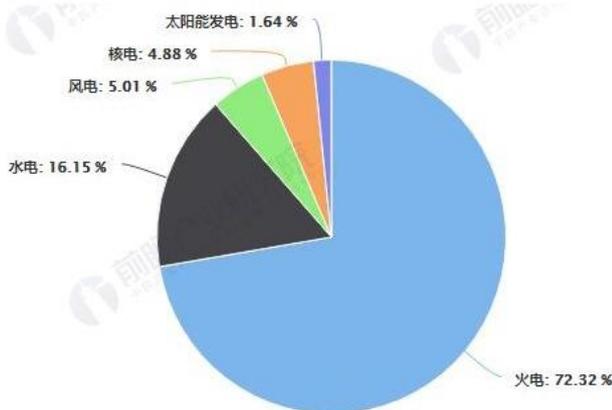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前瞻经济学人APP

2019年中國有三台核電機組投入商運營，分別為海陽核電2號，陽江核電6號和臺山核電2號。2019年核電裝機容量占全國電力裝機總容量的2.42%。雖然核電佔全國總發電量比重只有4.88%，但是，不能忘記的是，只要一次事故，不但全軍覆沒，而且遺禍萬年。

2019年中国各类电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统计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前瞻经济学人APP

據澎湃報導，2020年3月6日，海陽核電廠2號機組處於滿功率運行。16:06，反應堆冷卻劑泵

1A變頻器控制單元控制器故障，導致反應堆冷卻劑泵1A跳閘，反應堆按照設計自動保護停堆，操縱員執行回應規程，將機組穩定在正常運行壓力/溫度平臺。20:39，查明主泵1A跳閘原因後，運行值執行運行規程，準備將其它三台主泵停運後重新啟動所有主泵。在停運主泵前，需要根據規程隔離非硼化水源。現場運行人員在關閉除鹽水氣動隔離閥時，由於操作裝置挨在一起，誤將非能動安全殼冷卻水儲存箱出口氣動隔離打開，導致非能動安全殼冷卻系統A流道投入。

事件發生後，海陽核電廠根據《核電廠營運單位報告制度》第4.1.4條款“導致專設安全設施和反應堆保護系統自動或手動觸發的事件”，將兩起事件界定為運行事件，並向國家核安全局提交了運行事件通告。

中國國家核安全局表示，機組在兩起事件程序中，無放射性後果、無人員照射、無環境污染。根據《國際核與輻射事件分級手冊》，兩起事件均被界定為0級事件，即“無安全意義”的事件。

可是，公眾對核電的安全始終無法投予100%信任，心底總是膽戰心驚，俗語說：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德國汲取福島核災教訓，實施全面廢核。全球十大最安全核電廠中，德國佔據六座。德國境內核電站密集，成為了歐洲最大的電力淨出口國之一。但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核洩露的消息傳到歐洲後，數十萬德國人掀起遊行示威活動，要求政府放棄核電站。經過接近12個小時的激烈爭執和討論，德國執政黨最終拍板決定在2022年前關停境內全部17座核電站，全面廢核。2021年3月5日，德國政府發佈公告，對退出核電產業的德國企業給予24億歐元的賠償。

據悉，這筆資金的發放對象是在2010年前後因德國棄核政策而遭受經濟損失的企業。

2021年3月11日，福島核事故十周年之際，五位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2001-2006年）、菅直人（2010 - 2011年）、鳩山由紀夫（2009 - 2010年）、村山富市（1994年 - 1996年）細川護熙（1993年 - 1994年）共同發表“零核電”宣言，呼籲現任政府改變核電政策。

小泉純一郎在憲政紀念館舉行的會議上發表演講，他批判說，核電是自然、低價、清潔能源等論調“全部是謊言”，“在核電問題上沒有執政黨和在野黨之分，這是危及國民生命和國家經濟的問題，而且核廢料得不到解決的話，只有放棄核電站。”

菅直人也指出，這十年來，核電站生產的電力僅占總量的3%，而核電站的建設成本增加了三倍，使用完的燃料也無法處理。

多年前，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早已深刻提醒：“核事故一旦發生，不是死多少人的問題，而是影響多少代人的問題。當年的切爾諾貝利事故造成了廣闊的無人區，今年的福島事故也難以避免。核物質活動期長達上千年，將成為人類的一個大包袱。”

綜上所述，惟有零核電方解除公眾疑慮。



資料來源:

- (1) 【福島核災】日本環境大臣：建議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水，香港經濟日報，2019/09/10,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448487>
- (2) 德國將在2021全面廢核，為此賠償186億，或被追當好美附庸，2021-03-07, https://www.sohu.com/a/454561521_121040412
- (3) 何祚庥院士：中國核電發展絕不能搞大躍進, http://xn--fiqs8s1vd653b033a.xn--fiqs8s/xw/zjsd/201105/t20110526_3142587.shtml
- (4) 國家核安全局披露海陽核電站兩起“0級”運行事件始末，澎湃新聞，2020-03-2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36147
- (5) 現在的福島縣，到底怎麼樣了？，亞洲通訊社長徐靜波，澎湃新聞，2021-03-1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641235
- (6) 福島核廢水到底會不會放流入海？，亞洲通訊社長徐靜波，2020-10-19 17:22，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620343
- (7)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反應堆廠房上方發現嚴重污染，環球網，2021-03-10,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2FaiJL7Nve>
- (8) 五位日本前首相發表“零核電”宣言，鳩山稱希望小泉重返政壇，2021-03-12, 澎湃新聞,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676832
- (9) 2020年中國核電行業發展現狀分析 裝機規模及發電量保持增長趨勢, 2020-12-14, 前瞻產業研究院, <https://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300/201214-a4052bd0.html>

應對資本主義多重危機必須徵用銀行，讓銀行社會化 埃里克·圖桑

自2020年2月中旬以來，銀行股一直在暴跌。如果大金融機構持有人正在緊急出售這些股票，那一定是因為他們處於危險之中。[該系列第2部分：資本主義大流行、冠狀病毒和經濟危機。第1部分請參閱此文。]

政府和銀行當局有系統地謊報銀行壓力測試結果。主流媒體傳遞虛假資訊，因其依賴於銀行的廣告，此外，一些銀行家或他們的大股東也是媒體或彭博社等提供金融市場分析的機構的股東。中央銀行制定援助計劃的目的，並不是向患有冠狀病毒流行病的民眾提供緊急援助，無論是在歐洲、美國還是日本。中央銀行提供的大規模金融援助，主要是拯救私人銀行的大股東和一般資本主義的統治制度。

要說清楚銀行到底發生了什麼，讓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有必要無償地徵用沒收大股東，建立公民控制的儲蓄、保險和貸款公共制度，這是根本的。這就是廢除非法債務委員會(CADTM)所說的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完全社會化。

這項措施必須是規模更大的緊急、徹底和影響深遠措施的一部分，這些措施包括暫停並最終廢除公共和私人非法債務、關閉證券交易所、建立真正的國家衛生系統、徵用製藥公司和私營實驗室、能源部門公司(以便規劃和管理生態危機)，並將其置於公民的控制之下，以便改善人們的生活條件。

對冠狀病毒流行病的反應，應當成為機會，鼓勵在生活方式、財產結構、生產方式、激發人類與自然之間社會關係的價值觀方面，進行真正根本的革命。

只有制度的受害者動員起來，自我組織起來，把那1%的人及其走狗驅離權力位置，建立真正的民主權力結構，這種情況才能出現。一場生態

的、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的、自我管理的革命是必要的。

與官方聲明相反，銀行的狀況非常糟糕。不要誤會我們，現在，銀行的糟糕狀況並不妨礙其大股東、董事和高層管理人員的巨額收入。事實上，銀行狀態如此糟糕的原因之一，是銀行完全被榨乾了。

在過去的幾年裏，銀行已經支付了非常豐厚的股息。銀行董事的薪水很高。但還有一種間接的方式，讓股東從銀行賺大錢！銀行正在買回自己的股票。

銀行正在回購自家股票，以使其大股東更富有

各大銀行用來增加股東收入和財富的辦法，是回購他們在股市中的股份。近年來，銀行正在有系統地大規模地這樣做，尤其是美國銀行。在2020年2月初之前，如果他們的股價一直飆升，那是因為銀行董事，與主要股東達成協議，而且往往在央行以可憐利率而慷慨提供的流動性中，買回自己的股票。他們從誰那裏買回自己的股票？從自己的大股東那裏；當然，這些人賺大錢。下面是工作原理。以一位大股東為例，他收購了自己銀行的一批股票，假設每股70塊。如果每股價格上升到100塊，而大股東以100塊賣回給自己的銀行，那麼他每股收益為30塊。在一些國家，對股票的"資本獲利(capital gains)"甚至不徵稅，其藉口是，股票交易活動必須得到鼓勵！

對於兼任幾家銀行的股東及客戶來說，這是非常有利可圖的。事實上，他們是在玩弄兩種方式---回購股票部分的資本收益和他們保留在手的股票的股息。

當公司宣佈回購時，股東們非常熱情，因為他們可以期望以更高的股價從收盤價中獲得"

獎金”。因此，鼓勵他們持有自己的股票並接受回購價。這反過來又推高了股價。當一家銀行同時買回自己的股票時，便使其退出流通。這還有另一個優勢。股票的市盈率（p/e [price/earnings ratio]）得到改善，這就增加了對仍在流通中的股票的需求，銀行的價值也進一步上升。

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說：“從理論上講，股票回購對於公司價值是中性的，因為每一美元返還給股東，其資產負債表上就少一美元。然而，已發行股票數量的減少增加了每股收益——這通常可以推高價格——同時也增加了經理人的薪酬”[1]

需要指出的是，從2009年初到2019年9月底，美國大型銀行花費了8630億美元回購自己的股票。[2] 在谷歌、蘋果、亞馬遜和Facebook主導的行業以13940億美元買回其股票後，美國銀行業回購了數量最多的股票，比工業、能源和大宗商品行業還高。在上述期間，美國的回購總額為52500億美元。這是股市泡沫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樣的現象在其他大陸也可觀察到，並且具有同樣的效果。

圖1：銀行回購自家股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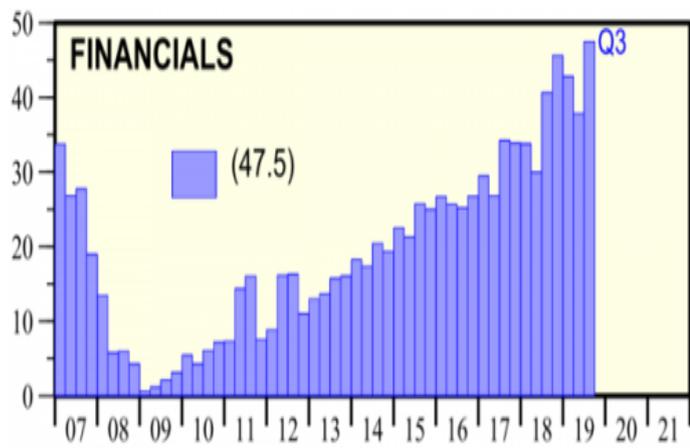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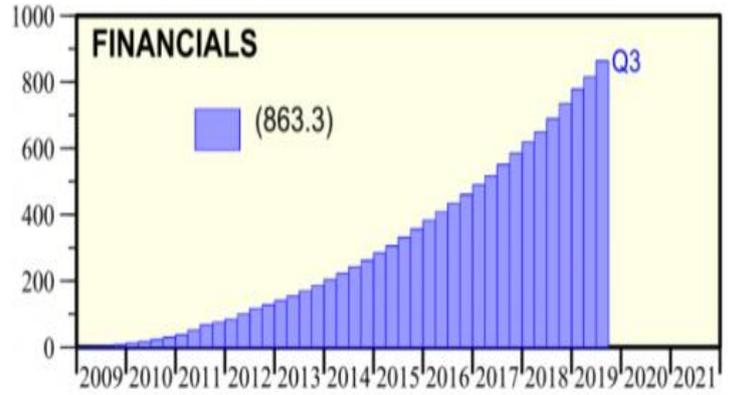


圖2：銀行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回購總額。



雖然，股票市場應該是資本主義企業家出售股票以發展公司時籌集額外資本的地方，但實際上充當了投機的聖殿，公司購買自己的股票，以有利於他們的大股東。這是股市應該關閉的原因之一。

這些純粹是虛擬資本的人為流動。[3]. 但這種錯覺可以持續多年。這就是剛剛發生的事情。

然而，這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過去兩三年來，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家和許多國際機構宣佈，股市的看漲週期即將結束，因為很明顯，投機泡沫已經發展起來，而且即將破裂。從2020年2月中旬開始，由於COVID-19大流行的擴大及其對中國經濟驅動力的影響，大股東們認為這場盛宴已經結束，突然決定出售大量股票。他們是第一個出售股票和中飽私囊的人。幾家養老金和投資基金緊隨其後，並下達了賣出股票命令，導致股價大幅下跌。

隨著2020年2月至3月金融危機，美國銀行在3月中旬宣佈，將停止購買自己的股票，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指出的，堅持認為，這種做法粗暴，會讓人難以接受。

在2020年3月，主要央行的行長希望讓人們放心，他們的說法產生了相反的效果。銀行股東認為，如果央行宣佈採取如此重大的措施（我將進一步分期作闡述），這意味著事情正在變壞，在賣出價格更低之前，可以賣出就趕緊賣出，沒有時間等待了。銀行股過去幾年的任何上漲都抵消了。但與此同時，用股市評論員的行話的說，

大股東已經預訂了利潤。他們賣出了大量股票，並賺得差價入口袋，這個差價，就是他們在股市泡沫開始時支付的價格與賣出清盤拋售運動開始時價格之間的差額。他們討價還價，賣股票給投資基金和對沖基金。大股東沒有賣出所有股票：現在股價非常低，他們仍然保留著手頭的股票，所以他們仍然對銀行決策有發言權（擁有4%至6%的股份，股東可以控制一家公司，無論是銀行還是其他類型的公司）。他們正在等待政府和央行啟動一些援助計劃，從而引發股價的上漲。現在猜測危機的持續時間和股市再次看漲的時間還為時過早。這可能需要幾個月，也可能要幾年。除了大流行病和製造業危機持續時間，社會和政治事件也會影響時間進度。

短期內，銀行將報告虧損，不交稅。他們將獲得大量來自政府和中央銀行的新禮物。我們必須小心區分仍然獲得利潤的大股東和銀行本身，後者的資本正在融化，其股價暴跌，將不得不報告損失，在某些情況下面臨破產。大股東認為銀行是最佳收入來源，即使這意味著將銀行推向破產邊緣。他們確信，他們持有的股份太大，不能倒閉。他們知道，由政府和中央銀行的朋友領導的公共當局會用納稅人的錢幫助銀行。當股價暴跌時，他們會立即出售大量股票，但將保留足夠的股份來控制公司。

大股東受法律的保護，該法律規定股東的責任僅限於其所在公司中持有的股份。即使他們要為巨額損失負責，他們可能失去的只是他們最初的股份。現在，他們沒有把他們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他們持有幾個公司不同部門的股票，他們的資產是多樣化的。他們大部分的財富都是比股票更堅實的資產：房地產、藝術品、黃金、遊艇、私人飛機.....

正如我在前幾篇文章中解釋的（"資本主義大流行病、冠狀病毒和經濟危機"和"不，冠狀病毒對股票價格的下跌沒有責任"），我們必須意識到，在股市動盪時期，大股東（和其他投機者）

正在滑行。當市場在開盤時看跌，股東們賣出股票包，如果市場再次看漲，他們會在價格非常低時買回股票。因此，有幾天股市暴跌，然後幾天，他們再次上升很短的時間。但目前的趨勢最明顯的是走向崩潰，股東正在大量拋售大量股票。



銀行股價的演變

歐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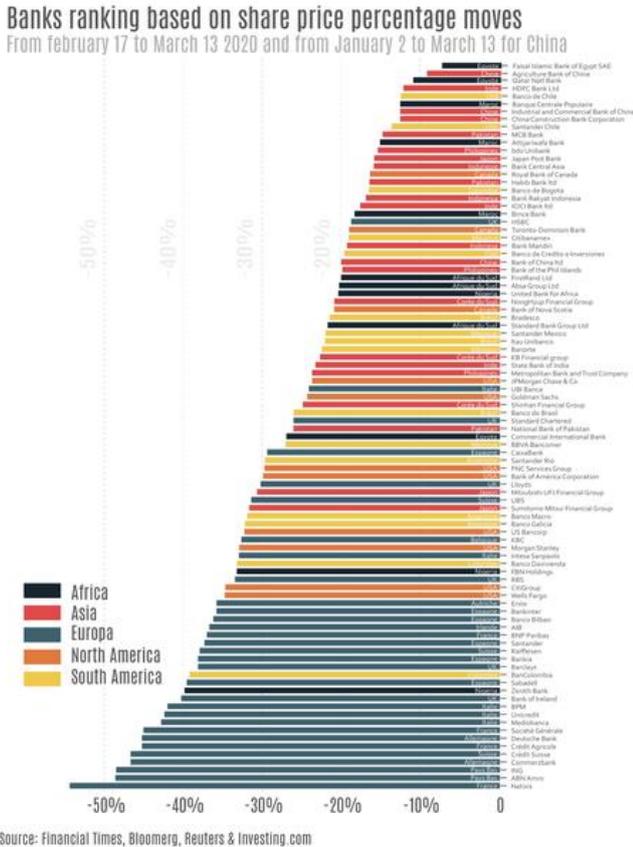
從2020年2月17日到3月12日，歐洲銀行的股價大幅下跌，損失在30%至45%之間。就Natixis（在上一次危機期間獲得救助）而言，下跌達到54%。

同期，北歐國家主要銀行的股價也出現下跌。Nordea(芬蘭)下跌了38%，SEB(瑞典)下跌了32%，Handelsbanken(瑞典)下跌了28%，Swedbank(瑞典)下跌了24%，Danske銀行(丹麥)下跌了36%。

美國八大銀行的股價大幅下跌；加拿大的銀行也一樣下跌，但沒有那麼多。墨西哥、哥倫比亞、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的主要銀行股價也暴跌。亞洲主要國家的所有主要銀行也都在股市下跌了。中國銀行的下跌比世界其他地區更為有限，但這次下跌實際上在1月份已經開始。日本銀行跌幅最大。

非洲四大經濟體的銀行股份也在暴跌。尼日利亞銀行遭受到股價下跌最嚴重的打擊。

根據2020年2月17日至3月13日股價下跌的程度對銀行的排名



我們清楚地看到，從2020年2月17日到3月13日，歐洲銀行的股票下跌得最劇烈。

在另外一期中，我將分析銀行目前的情況。接下來，我將討論國際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其他方面：石油價格暴跌；私人債券市場泡沫破滅的前期跡象；私人債務證券價格暴跌，收益率（yields）和風險溢價（risk premiums）急劇上升；公共債務證券價格上漲。主導經濟體的政府通過負利率獲得融資，但累積了非法債務。我還將提及航空公司和航空航太工業的跌落。還將討論各國央行和政府的反應。

考慮到危機的快速發展，該系列論述的結構可能會發生變化。在每一部分，我將提出要採取的措施。

邁克·克羅利科夫斯基、克莉絲蒂娜·帕格努爾與蘇紹萬·達爾從法文翻譯為英文。

註釋

[1] 英國《金融時報》2020年3月20日——“銀行主導的股票回購凍結可能蔓延在美國市場”。

[2] S-P 500 回購和股息buybackdiv.pdf.

[3] “虛擬資本是一種資本形式（公共債務證券、股票、債務），其流通於從生產收入到其所應享權利的只是承諾，根據定義，其結果是不確定的。” 弗洛里安·古利（Florian Gulli）對塞德里克·杜蘭（Cédric Durand）的採訪，“虛擬資本，塞德里克·杜蘭”，計劃評論。

La Revue du projet

米歇爾·胡森（Michel Husson）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框架允許他分析‘虛擬資本’，這一框架可以定義為一組金融資產，其價值基於未來收入流動的資本化：” 虛擬資本的形成稱為資本化。[卡爾·馬克思，資本，第三卷]。如果一個股票的年收入為“100”，而利率為5%，其資本化價值將是“2000”。[3] 但這個資本是虛構的，因為“絕對沒有任何與資本發展過程有任何關係的痕跡”[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米歇爾·胡森，《經濟》一文，2011年12月，“馬克思與金融：一個應用...” ； “Marx et la finance : une app...” 讓-瑪麗·哈里貝（Jean-Marie Harribey）：“當實現價值與承諾價值之間的差距變得太大，一些投機者明白，當利潤清算的承諾不能兌現時，當金融收益因生產缺乏足夠的資本收益而永遠無法實現時，泡沫就破滅了”。讓-瑪麗·哈里貝，《虛構資本的咆哮，讀塞德里克·杜蘭的虛擬資本》，《可能性》第6號—2015年春天。Les Possibles, N° 6 - Spring 2015.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2020年4月7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page=imprimer_articulo&id_article=6513

印度與殖民地債務

蘇紹萬·達爾

前印度部長和國會議員沙希·塔魯爾 (Shashi Tharoor) 要求英國為其數十年的帝國統治向印度和其他前殖民地支付賠償。2015年，著名的牛津大學辯論社 (Oxford Union) 組織了在一場題為“辯方認為英國應當賠償她以前的殖民地”的辯論，他在辯論會上作了這番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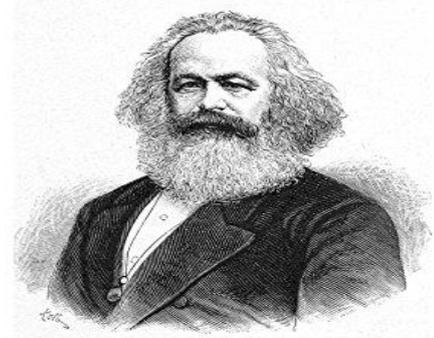
在英國人離開61年後，辯論社選擇這樣一個話題，真的很有趣，眾所周知，除了印度的政治統治權之外，英國東印度公司還獲得了茶葉貿易的獨家壟斷權，而且基本上壟斷了中國與歐洲的貿易來往和貨物運輸。但是印度的沿海貿易和島嶼之間的貿易，以及印度的內部貿易，由該公司高級雇員壟斷。鹽、鴉片、檳榔和其他商品的壟斷權是取之不盡的財富之地。員工自己定價，隨意掠奪不滿的印度教徒。總督參加了這種私人交易。他最愛的是獲得合同，這些合同的條件讓他們可以無中生金，比煉金術士還聰明。一天之內，大量財富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分文不花，就可以推進原始積累。

沃倫·赫斯廷斯 (Warren Hastings) 的審判中充斥著此類案件。舉一個實例。某個叫沙利文的人，接受官差，要去遠離鴉片地區的一個印度地區，在離開時，他得到了一份鴉片合同。沙利文以40,000英鎊的價格將合同賣給了一位叫丙的人；丙當天以60,000英鎊的價格將其出售，執行合同的最終購買者宣稱，他總算實現了巨大的收益。根據提交給議會的列單之一，1757-1766年，該公司及其員工的從印度人那裏獲得了600萬英鎊這樣的禮物。在1769年至1770年之間，英

國人購買了全部大米，除非賣價高昂，否則拒絕再出售這些大米，因而製造了饑荒。

卡爾·馬克思·第三十一章：產業資本家的起源，《資本論》，第一卷

Karl Marx



THE
CAPITAL

塔魯爾 (Tharoor) 指出：“當英國抵達印度時，印度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為23%。到英國人離開時，這一比例已降至4%以下。為什麼？因為印度被統治，只不過是為了英國的利益。英國200年來的崛起，是由其在印度的掠奪所資助的。 [1]

當然，關於從殖民地轉移到帝國中心的財富數量，可以議論，但是他的說法值得考慮。而且，他並不是唯一提出這一要求的人。著名的經濟學家烏薩·派特奈克 (Utsa Patnaik) 估計，英國從印度吸走了45萬億美元。 [2]

流失理論

達達巴伊·納約雷吉(Dadabhai Naoroji)是19世紀印度政治界的重要人物,他談到過,每年流向英國2億至3億英鎊。他是處理這個問題的先驅之一。英國的虹吸系統採取了各種手段,“流失由兩個要素組成,第一,來自于歐洲官員匯出他們的儲蓄,以及他們在英國的開支,因為他們在英國和印度有各種需要;以及在英國支付的養老金和工資;第二,來自非官方歐洲人的匯款。” [3]

他估計,這種流失是由於歐洲雇員的各種定期匯款回國造成的,包括資助家庭、取回儲蓄、購買英國商品——個人和政府;英國持有的公共債務的利息費用(不包括鐵路貸款的利息支付和生產性工程產生的其他債務)。除此之外,殖民地印度被迫支付一定數額,用於治理、維持軍隊、戰爭開支、退休軍官的養恤金以及英國為維持殖民地而應承擔的其他開支,即所謂的‘家庭費用’(Home Charges),這包括在英國籌集的公共債務利息、鐵路和灌溉工程的年金,還有支付給在印度工作的英國雇員,以及在印度工作的退休雇員的養老金。[4]

雖然從過去到現在,仍然無法準確估計,在英國統治期間從印度流向英國的資金量,但有一些估計說明了這種流失量。韋爾薩·安斯蒂(Versa Anstey)估計這些‘家庭費用’每年約為3500萬英鎊。此外,因為提高貸款,英國統治者意識到了與印度本土統治者作戰的成本。[5]韋雷爾斯特(Verelst)估計,在普拉西(Plassey)戰役剛結束的五年中,從印度流出的貨物和金條總量為49,416.11英鎊。SB·掃爾(SB Saul)也根據國際收支情況,估算了這種流失,僅1880年的數字就佔印度國民收入的4.14%。納奧羅吉(Naoroji)的初步估計是每年800萬盧比,1893年

高達2000萬盧比,1905年每年5.15億盧比。包括加內什·維揚卡泰什·喬希(Ganesh Vyankatesh Joshi)、丁尚·埃杜爾吉·瓦查爵士(Sir Dinshaw Edulji Wacha)、蘇倫德拉納特·班納吉爵士(Sir Surendranath Banerjee)和羅梅什·春德·杜特(Romesh Chunder Dutt)在內的其他許多人也做出了類似的估計。儘管這些估計同即將成為本土資產階級成員或其政治代表的估計存在一定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財富正持續地從印度次大陸轉移到英國。

英國增長不利於印度

歷史學家伊爾凡·哈比蔔(Irfan Habib)對這種巨大的資源流失的觀察很有啟發性。他指出,“當經濟學家談到缺乏內部發展能力或人均收入基數低時,必須銘記印度必須省下其國民收入的4%作為進貢,而英國人無論他們多麼努力,都無法拯救印度。[6] 很明顯,從印度到英國的大量資源和金條的流失,對印度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對英國經濟產生了有利影響。計算表明,超過三分之一的印度國民收入被英國人以某種形式拿走。

在調查印度頻繁爆發饑荒的原因時,RC杜特(RC Dutt)評論道,‘目前,地球上任何國家都無法解釋印度的資金流失,每年淨收入的一半流出印度,意味著印度的水分祝福和養肥著其他土地’ [7].....” 如此巨大的經濟土地資源的流失,將使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變得貧困;它使印度淪為饑荒之地,比印度歷史上任何時期的饑荒都更頻繁、更普遍、更致命。” [8]

從殖民地到帝國中心的巨大資源流失,自然對印度經濟及其人民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這些資源不是投資在印度,而是被掠奪並且流向英國。此外,政府償還巨額公共債務,需要增

加民眾的稅收負擔。1886年，印度的稅負佔其總收入的14.3%，與英國的6.93%相比，這一負擔非常高。[9]

大部分稅收用於償還英國債權人。自然，這一機制使印度農業與工業陷入貧困。與其他帝國經濟政策一起，造成了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停滯不前的經濟。“十八世紀的印度一個擁有偉大的製造業和農業的國家，印度紡織機的產品供應了亞洲和歐洲。不幸的是，東印度公司和英國議會.....在英國統治初期，為了鼓勵英國崛起的製造業，對印度製造業進行打壓.....數百萬印度工匠失去了收入；印度人民失去了他們財富的巨大來源。”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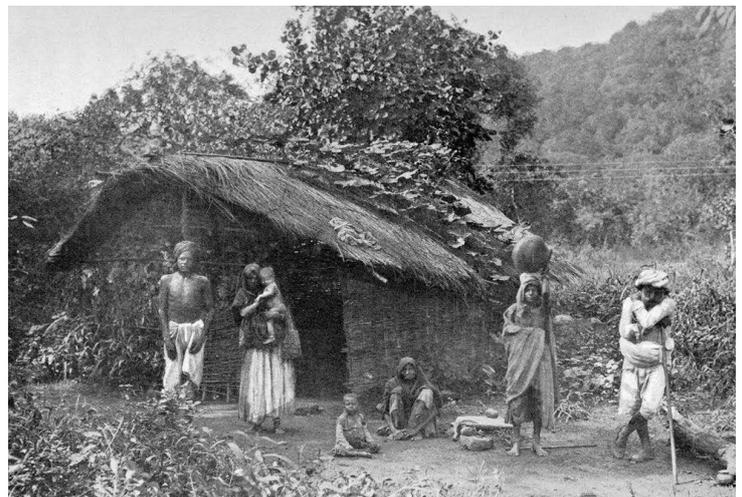
這種資源的流失對農民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支付這種流失的，是從農民那裏徵收的土地收入。據邁克·大衛斯（Mike Davis）說：“例如，在十九世紀末的孟買德坎，每年的稅收徵收過程始於在村莊糧場中扣押糧食。為了食用自己的收穫，瑞特人[11]不得不立即借錢來還清稅款。通常，借債人以當前市值的一半購買作物，但以高達38%的利息借錢。如果農民不能及時償還這一貸款，過高的利率將欠款膨脹到天文數字。” “我記得我面前的一個案件，” 一位前地區官員寫道，“其中一名種植者被起訴，要求償還900盧比，包括本金和利息，原來的債務是只值10盧比的糧食，幾年前借來的。” [12]

印度鐵路

英國殖民擴張和帝國主義的擁護者一直聲稱，儘管有缺陷，但正是殖民者引進的優越的西方科學技術，才使印度從中世紀的籠子裏脫身。印度的鐵路建設被認為是這種現代化的主要例子之一。當然，如此規模的鐵路網在殖民地是無

與倫比的。然而，應該指出，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歐洲的國家，在沒有殖民造成的苦難的情況下修建了鐵路。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我們發現鐵路最初是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為自身的利益設計的。用哈丁格（Hardinge）總督的話說，鐵路將有利於 “國家的商業、治理和軍事控制”。[13]

在其概念和建設上，印度鐵路是一個巨大殖民騙局。英國股東通過投資鐵路，使巨額資金變得荒謬，因為政府保證每年的淨資本回報率為5%，而任何其他安全投資都得不到這些回報。當時，這個比率高超，可能是因為政府彌補了其稅收的不足，當然，這些收入來自印度，而不是英國的稅收。[14] 對於英國股東來說，這確實是一筆意外收穫，他們獲得政府的擔保，由印度而不是英國的稅款全額支付，對鐵路進行了天文數字的投資。毫無疑問，對英國人來說，這是一個了不得的勒索，犧牲了印度納稅人的利益。



饑荒和死亡

在被殖民的印度，英國政府從未真正承認的一個反復出現的特點是饑荒。1760年至1943年，可怕的饑荒經常襲擊印度。根據來源於英國官

方的資料，可以估計，超過8500萬印度人死於這些饑荒，這些饑荒達到了種族滅絕的程度。《紐約先驅報》的記者約翰·羅素·楊 (John Russell Yong) 為其論點找到了更多的證據，“證明英國人在東方的影響，只是英國暴政的另一個名字。”……楊在權衡印度人承擔的帝國成本時，總結道，“沒有暴政比印度政府更專制，強橫，不負責任，殘忍...” 楊意識到，根據官方統計，過去三年中有500多萬印度人死於饑荒，他強調，“英國每年從印度拿出的錢嚴重消耗了印度，也是該國貧困的根源之一。” [15]

來自印度的收成被掠奪來養活英國人。“頭連到腳，他們的屍體伸展的長度，將達到英格蘭的85倍以上。這發生在印度出口數量空前的糧食的情況下，每年高達1000萬噸。” [16] 它完全不是自由市場政策的結果，而自由市場只是藉口，利用乾旱引起的饑荒為掩蓋，被用來為種族滅絕辯護。此外，英國的政策，包括禁止饑荒救濟工作、繁重勞動死亡營、死亡遊行、“饑荒稅”、極端的內部關稅、禁止本土工業與英格蘭工業競爭等等。

除了數百萬印度人死亡和被糟蹋之外，正是這種超級剝削使英國變得富有。在啟蒙運動之前的幾十年裏，像世界上許多其他地區一樣，包括在東南亞和中國，歐洲人用槍炮完全控制了印度的港口，以及1757年普拉西戰役對孟加拉的掠奪（這完全造成了世界最嚴重的饑荒：1000萬人死亡——佔人口的三分之一，曾經有著比倫敦更繁榮的城市的地區）後立即有了工業革命，這並非巧合。然而，在維多利亞統治結束時，各國的不平等與階級不平等一樣嚴重。人類已經不可挽回地分裂了。國際敦促出現的有名的‘饑餓囚徒’，就像電燈、馬克沁機槍和“科學” 種族主義一樣，都是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現代發明。[17]



殖民債務和賠償

印度的殖民統治進程意味著對數百萬人的經濟剝削和破壞，對興旺發達的工業的破壞，有系統地剝奪競爭的機會，取消原住民治理機構，改變自古以來蓬勃發展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模式，以及消滅被殖民者最寶貴的財產、他們的特性和自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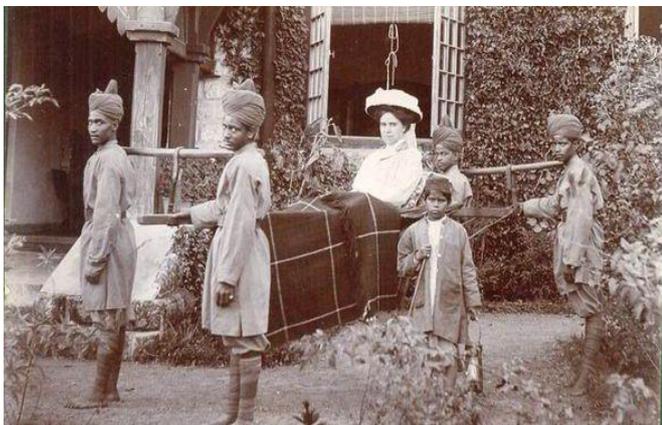
印度教與穆斯林對抗的產生和延續，是英國帝國政策最重要的成就：分而治之的計劃在1947年英國權威的崩潰中達到頂峰。分裂留下了100萬人死亡，1300萬人流離失所，數十億盧比的財產被毀，社區仇恨的火焰在被蹂躪的土地上熊熊燃燒。對於英國在印度統治的失敗，沒有比其悲慘結局更具有控訴力量的了。

這些數字只講述了故事中很小的一部分，但確實幫助我們想像，自1492年以來，從殖民世界流向歐洲的財富規模。對殖民主義造成的苦難加以計價是極其困難和不公平的。世界上是否有足夠的資金來補償造成的損害？“適當的塑像能否成為殖民主義罪惡行為的象徵贖罪方式？那個農民受害于英國稅收的嚴重影響，為什麼英國政府不為這位不知名的印度農民豎立一座雕像呢？讓其與站在白廳的羅伯特·克萊夫 (Robert Clive) 塑像相對？” 尼克·羅賓斯問

道。[18] 克萊夫，英屬印度總司令，是建立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軍事和政治霸權的一名英國軍官和私掠者。他是主要掠奪者之一，從印度掠奪所得，用以在英國買官鬻爵。他的雕像毫無爭議地矗立在英國政府所在地的白廳中心。

每當提出殖民債務及其賠償問題時，我們需要立即擺脫關於慈善的討論。這不是一個可以僅僅歸入經濟學的問題，而是在道德和道義上，承認帝國主義虧欠世界其他地區的債務。實際要求的賠償範圍，包括正式道歉、無條件取消第三世界債務、還有真正抑制殖民本能的經濟賠償，因為殖民本能有時會重新浮出水面，就像現在，以新自由主義的化身為形式，極端壓迫地球上的大多數人 --- 沒有邊界地壓迫。

來自蘇格蘭著名作家和歷史學家威廉·達林普爾(William Dalrymple)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按照英國學校教授歷史的方式粉飾殖民企業的問題。“大英帝國沒有出現在教科書的教學大綱中，” 達林普爾說，“英國兒童閱讀關於都鐸王朝(Tudors)，斯圖亞特(Stuarts)，然後關於希特勒的東西。而英國人在兩者之間所扮演的角色被拋在了一邊。” [19]



註釋:

- [1]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dr-shashi-tharoor-tells-the-oxfordunion-why-britain-owes-reparations-for-colonising-india-in-viral-10407997.html>.
- [2] <http://www.cadtm.org/How-Britain-stole-45-trillion-from-India>.
- [3] 納羅吉·達達巴伊，《印度的貧困和非英國統治》，倫敦，S. Sonnenschein，1901年。
- [4] 同上
- [5] <http://www.economicdiscussion.net/indian-economy/the-drain-meaning-causes-and-consequence-indian-economy/19014>.
- [6] 同上
- [7] 羅梅什·杜特，《印度饑荒 - 他們的原因和預防》，Ps 國王和兒子，倫敦，1901年。
- [8] 同上
- [9] <https://abhimaniuas.com/blogs/Important-Issues-Detailed-Article/7781/Drain-of-wealth-and-Indian-Nationalism-br-1857-1947-Indian-History-General-Studies-Paper-I-By-abhimanu>.
- [10] 同上
- [11] 印度農民或租房農民。
- [12] 邁克·大衛斯，《維多利亞時代晚期大屠殺——厄爾尼諾饑荒與第三世界的製造》，Verso，倫敦，2000年。
- [13] <https://www.outlookindia.com/magazine/story/chronicles-of-the-colonial-loot/298029>.
- [14] 同上
- [15] 邁克·大衛斯，《維多利亞時代晚期大屠殺——厄爾尼諾饑荒與第三世界的形成》，Verso，倫敦，2000年。
- [16] 同上
- [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professionalsnetwork/2015/nov/27/enough-of-aid-lets-talk-reparations>.
- [18] <https://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london-jlf-2016-knowledge-not-money-best-form-of-reparation-for-colonial-rule/article8633116.ece>.
- [19] 同上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2019年10月10日，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page=imprimir_articulo&id_article=6240

悼念陳鏡林

楊林



2007年9月陳鏡林受邀到日本參加陳獨秀學術討論會，作了《陳獨秀思想的三次飛躍》學術演講。

在陳鏡林逝世周年的日子，我萌生了寫篇悼文的念頭。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延宕了四個多月才擱筆。與他七十四年來積澱的深厚友誼相比，這四百多天時間的磨礪，絲毫沒有消滅我對他的深沉悼念。2019年6月28日，他突發大面積心肌梗死，入院搶救，昏迷了一個星期後，我到醫院重症監護室看望他，見他沉睡在病榻上。我壓制抑鬱的心情，在他耳旁大聲喊：我來看你啦！握住他的右手持續搖晃，用左手摸他的臉頰，好一會兒，發現他的眼皮輕微顫動。我喊得更起勁了，終於見他半開了眼，並微微點頭。我高興得連忙叫他女兒，你爸爸醒啦！接下來他的病情有所改善，轉到普通病房，大家充滿希望。經歷了一個多月，卻終於再次惡化，於2019年8月7日與世長辭。我陷入無邊的沉痛之中。

陳鏡林1930年生於溫州農村，原名陳兆魁。家無耕地，全靠爺爺手工做紙維持一家生活。幼時的他飽受饑寒貧困的蹂躪。村中大多是無地或少地而租種地主田地的農民，生活都很困苦，一張張愁眉苦臉給他幼小的心靈刻下深深的烙印。他父親出身棉布業學徒，上過四年私塾，粗識文字。憑著勤懇和辛苦經營，使家境有所改善，這才使得陳鏡林有條件上學。而整個小學和初中階段都在抗日戰爭中度過，親身經歷日本帝國主義對溫州多次飛機狂轟濫炸，百姓死傷無數。三次軍事佔領，每次都姦淫燒殺，大肆掠奪大米、黃豆、食糖、牛、豬、雞、鴨、木材、布匹及各種戰略物資。瘦弱的他還曾被抓去抬稻穀，因無力而被日本兵的皮鞭抽打。他對日本帝國主義恨之入骨。

1945年秋，他考入當時溫州最高學府溫州中學高中部。這裡彙集了溫州一批最優秀的青年。他們學習成績優秀，思想活躍。課後擠滿了圖書館、運動場，還有多個課外小組，自由參加。面對腐敗的國民黨統治，搜刮民財、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對時局不滿的同學，關注社會問題，參加時事討論小組，對中國社會現狀和社會性質，蔣介石買辦資產階級與美帝國主義勾結下中國的前途等問題開展熱烈討論。開始時，陳鏡

林專注於功課，對古今中外歷史有濃重的興趣。直至國民黨發動內戰，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尤其是1947年南京學生自治會主席于之三被國民黨殺害引起的席捲全國的“六二”學潮，陳鏡林被捲入浪潮的漩渦之中。他與班級同學編寫壁報，創作反饑餓、反內戰歌曲，書寫標語直至深夜才回家。他積極參加反蔣反饑餓反內戰示威大遊行，高喊反對內戰，反對徵兵征糧，號召全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遊行過後，陳鏡林陷入深思：中國革命的前途是什麼？共產黨的同學爭取他參加讀書會，介紹他閱讀《新三民主義》，對他宣傳共產黨的革命主張。他對農村實行“二五減租”政策產生反感。他認為孫中山都說“耕者有其田”。回憶幼年貧困農村，農民一年忙到頭，好容易盼到秋收，把糧食挑到家，卻要把大部分好的稻穀送給地主，自己留下小部分，甚至不夠全家一年吃的。後來認識到這是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他認為中國要革命，首先要沒收地主的土地，均分給農民。與他同班的托洛茨基派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認為中國革命應如俄國十月革命，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及其買辦階級相比要弱小得多，不能領導中國進行並完成民主革命，因此只能由無產階級領導先奪取政權，在革命進程中完成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進而建設社會主義。他在托派組織的讀書會中閱讀了恩格斯的《共產主義ABC》、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恩格斯著林超真（鄭超麟）譯

的《自然辯證法》，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多部馬列主義原著。從這些經典書籍中逐漸理解無產階級革命的原理和路線。酷愛歷史的他特別當讀到有關中國1925—1927年大革命的著作——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才恍然大悟中國這次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斯大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和由他指揮的共產國際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造成的。共產國際要求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以黨員個人的身份參加國民黨，要服從國民黨的紀律，不准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許共產黨獨立創辦日報，使中國工農群眾聽不到共產黨的革命號召，使中國共產黨依附于國民黨，完全失去獨立性。斯大林基於大國沙文主義，根本不把中國革命利益和中國共產黨放在眼裡，從自身利益出發，依靠、扶持甚至縱容蔣介石掌握政治和軍事大權，施行軍政獨裁，推崇蔣介石反革命集團領導中國民主革命。武裝蔣介石，而反對武裝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群眾，反對共產黨掌握革命領導權，把共產黨壓低為國民黨的附庸和苦力。

托洛茨基主張中國共產黨要成為無產階級獨立政黨，要豎立鮮明的革命旗幟。一貫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在革命的緊要關頭，多次提出共產黨要退出國民黨，吸引工農群眾到共產黨周圍，號召工人建立蘇維埃，使之成為一切真正革命組織的吸引中心。

當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佔領南昌時，便建立他的反革命中心。但這時他正面臨唐生智等反對他的壓力，正孤立無援。斯大林再次支援挽

回憶

救他，及時簽署聯共政治局會議決定，電令鮑羅廷向蔣介石表示支持：“同意總司令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線關係駐在南昌，但國民政府駐在武漢。”當蔣介石以辭職相威脅時，斯大林電告鮑羅廷向蔣表示：“我們理解形勢的複雜性和你所面臨的困難。但是我們認為，你有哪怕是暫時的退出領導崗位的情緒也是危險的。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你的領導。”蔣介石在得到莫斯科的支援，站穩腳跟後，即轉而發表反共演說，制裁共產黨，誘殺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接連搗毀南昌、九江、安慶、南京等地的共產黨黨部和總工會，以回報斯大林。

針對斯大林掌控的共產國際1927年3月18日刊登的《論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與國民黨》的社論所強調：“中國革命此刻的任務中的任務，乃是國民黨的地位，在南部中國屬於領袖地位的國民黨之往後發展。”托洛茨基發表《論中國革命的階級關係》批評道：“這樣看來，任務中的任務竟不是數百萬工人在職工會和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覺醒和統一，不是將貧苦農民和手藝工人吸引至運動主流，不是加深共產黨爭取無產階級的鬥爭，亦不是加深無產階級爭取數百萬被剝奪了產權的群眾之鬥爭。”斯大林的無產階級革命立場哪裡去了？托氏指出：“斯大林指示中國共產黨幫忙將工農的血液注入國民黨的政綱，不會產生什麼結果，也不能有什麼意義。那裡也有另一種工農血液。中國工人正在流血，不是為階級覺悟的任務流的（被蔣介石屠殺的血）。加入國民黨的工人將是國民黨的黨徒，這

就是說，這個無產階級的原料將在那個小資產階級的孫中山模型裡重鑄過。要阻止這種事情發生，工人們必須在共產黨中受教育。可是為了這，共產黨必須完全解脫任何外面的限制，能自由地領導工人鬥爭，且以列寧去對抗孫中山主義。”托氏進一步指出：“進行不獨立的共產黨政策，供給國民黨以工人，乃是準備了條件，讓人們最成功地在中國建立法西斯專政，而且在不很遠的將來，無產階級不管如何，總是被逼從國民黨中退出來的。”托氏1927年4月3日這一預言，不幸在九天后被蔣介石的上海“四·一二”和三個月後蔣汪聯合的武漢“七·一五”兩次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大屠殺，而最終被逼退出國民黨所準確證實。

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關於中國革命的第一次演講》指出：“三月十六日，在蔣介石政變短短一個月前，《真理報》的一篇社論宣佈反對派（指托氏）的罪狀，因為反對派相信資產階級居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首，且在準備叛變。《真理報》非但不把這一真理明白告訴中國工人，反而憤慨地加以否認。社論爭辯說：‘蔣介石是服從國民黨紀律的。’還是在四月五日，即在蔣介石政變前一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活動分子會議上排斥拉狄克的意見，且再度聲明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七天之後，蔣介石用機槍和屠刀表明他的反動的國民黨的紀律性。斯大林為掩蓋錯誤，隱藏了他四月五日的講話記錄，並說汪精衛是國民黨左派，命令中國共產黨投奔武漢汪精衛政府。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托洛茨基作第二次演講時指出：“斯大林在此地再次宣佈反對建立工農蘇維埃。理由是國民黨和武漢政府已經是足夠的手段和工具，為土地革命之用了。以此，斯大林負起了，而且要國際也負起國民黨與武漢政府的政策的責任。我們與這個政策無共同之點，我們絲毫不要替武漢政府和國民黨領導者的政策負責。我們迫切地勸告共產國際拒絕負擔這個責任。我們直接對中國農民說：假使你們服從武漢領袖，不組織你們自己獨立的蘇維埃，則汪精衛一類的左派國民黨領袖，一定要出賣你們的。土地革命是一樁嚴肅的事情。汪精衛型的政客，在困難情形中，將十次地與蔣介石聯合起來反對工人和農民。……我們對中國工人們說：假使農民不由你們，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而由小資產階級激進派領導，那末不能將土地革命進行到底的。因此，建立你們的工人蘇維埃，將它與農民蘇維埃聯合起來，由蘇維埃武裝你們自己，吸引兵士代表們到蘇維埃來。……只有經過農民兵士蘇維埃，你們才能爭取蔣介石兵士大多數到你們方面來。你們，前進的中國無產者，假如相信不到二十五萬人的那個領袖的組織（國民黨）、小資產階級與妥協成性領袖組織，能夠代替那包括成千百萬人的工農兵蘇維埃，那你們便是你們的階級與你們的歷史使命的叛徒。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不將在蘇維埃形式中前進而勝利，則將完全失敗。

由於斯大林害怕中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聽到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正確指導思想，將它

們完全封鎖，執行他自己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結果導致蔣汪聯合反共的武漢“七一五”大屠殺，中國共產黨被迫退出國民黨，宏偉的中國大革命終於以失敗告終。

陳鏡林惋惜和痛恨這場深刻影響中國革命發展進程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偉大歷史事件的前途，被愚蠢而專橫的斯大林所斷送；而對於被斯大林封鎖，匱乏情報資料的情況下以高度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經驗，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立場，無誤判斷中國革命形勢，給出準確事變預言，提出正確的革命策略和路線的托洛茨基敬佩不已。

接著陳鏡林又讀了《震撼世界的十日》、《列寧傳》、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以及上海托派多數派出版的《青年與婦女》、《求真》和少數派出版的《新旗》等書刊，思想上基本接收托派的無產階級不斷革命論；而在組織問題上採取慎重態度，直至1949年2月，由徐聯芬介紹參加溫州托派社會主義青年團。入團之後積極領導兩個周邊組織“讀書會”，宣傳馬列主義和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

1950年秋，他考入了久久嚮往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對清代以來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國革命史進行系統研究。北大優越的學習環境使他孜孜不倦地沉浸在歷史研究中。

1952年12月23日的全國肅托運動中，陳鏡林在北大被捕，判刑五年。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掀起反對個人迷信，揭露斯大林在列寧死後謀取領導權，對聯共政治局除他之外的

回憶

所有成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以及大批堅持馬列主義的老布爾什維克，捏造各種莫須有罪名，清除異己，用各種嚴刑拷打，驅逐暗殺，製造震驚世界的莫斯科審判案。當年6月，公安部和北京公安局將北京天津“勞動改造”的托派成員集中到北京，組織參觀北京十項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然後學習總結。負責學習的幹部告訴陳鏡林等人：“你們都是大專學歷的，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這樣的人才。”大家都等待分配工作。然而秋風帶來了“匈牙利事件”的消息，風向變了，生活也變成半天學習，半天勞動。直至1957年2月28日，正是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發表的日子，陳鏡林被提前十個月釋放，回到故鄉溫州。他繼續堅持研究中斷了四年多的近代史和中國革命史。

1993年他參加北京陳獨秀研究會，並先後瞻仰四川江津陳獨秀晚年舊居和安慶陳獨秀陵園。並在《風雨人生》第五期上發表《訪江津，仰獨秀》，文章以一首七律引路：

遙路三千訪江津，連年心事竟成行。
文章光澤潤百代，意氣高昂壓群英。
山花寂寞先賢去，江水長流後繼頻。
問道當年德與賽，光焰萬丈照今程。

繼而詳述石牆院的情景和陳獨秀在江津的生活經歷和觀感。最後表述：“二十世紀前半葉，曾在中國近代史上叱吒風雲的陳獨秀，死後他的英名正如史學家王觀泉先生1994年說的‘像盜

天火的普羅米修士被綁在恥辱柱上，終於沒有走下高加索’。他是一顆彗星，不可與世人見面，深恐烈火再度把天空燒亮。然而經過苦難的中國人很快從愚昧中覺醒，曾幾何時，禁區打開了，陳獨秀問題又浮出水面，多年壓地，他又將是一個巨人站起來，“民主、科學、社會主義”又向我們走來。

他積極投入為陳獨秀被誣“右傾機會主義”等罪名平反的努力。當他細讀了中央文獻出版社《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叢書》1—6集，贊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獨秀研究會會長唐寶林主編《重新認識陳獨秀》中的論文《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紀實》《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和他的巨著《陳獨秀全傳》中的觀點和論據：“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偉大思想家、革命家、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但同時也是中共黨史上第一個最大冤假錯案的受害者。”自1927年八七會議直至1951年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不實地給陳獨秀扣上了十頂帽子：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事實上，上述《共產國際·聯共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叢書》揭示，證實斯大林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左右共產國際，強迫中國共產黨和陳獨秀執行中國革命的各項決議和政策。唐寶林在《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中指出：“1923至1927年，斯大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討論中國革命問

題共召開122次會議，作出738個決定，從大的決策（如令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對待國民革命總方針）到小的決定（如何結束五卅罷工，何時找蔣介石談話，談時要注意什麼問題等等）考慮全面細微，然後命令駐華大使加拉罕、駐國民黨顧問鮑羅廷、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羅易等直接執行或佈置給中共中央並監督執行。中共中央還要直接受加拉罕和鮑羅廷等人的指導和監督。所以陳獨秀的實際權力和工作範圍是很有限的。在革命緊急關頭，針對蔣介石反共，陳獨秀提出中國共產黨要有獨立性，應與國民黨外合作，多次提出退出國民黨，都被斯大林嚴辭拒絕，哪裡可能有什麼陳獨秀的主義和路線呢。而斯大林獨斷在中國大革命時期貫徹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例如1925年8月21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決定：指示中共必須“避免加劇關係”，指示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瓦西裡耶夫起草《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中共：（一）“對國民黨工作的領導應當非常謹慎地執行”，“黨團不要發號施令”；（二）“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的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三）“相反，共產黨應當竭力廣泛吸引（未參加共產黨的）國民黨員……參加本國民族解放鬥爭事業的領導工作。”這個指示以“謹慎”束縛共產黨，令共產黨放棄在國民黨黨政軍的領導職位，實際上就是放棄革命的領導權。

再來看忠實貫徹斯大林主義的穆辛提綱，強調：“現在革命勝利後走向全國政權的黨不是

共產黨，而是國民黨。在人民革命取得勝利時，中國無產階級只能指望自己目前常常是奴隸般的地位有一定改善，……所以現在共產黨應該做國民黨的苦力。”提綱主張：（一）“共產黨不應公開提出壟斷工人運動的要求。”（二）“農會不應由共產黨一手建立，也要吸收國民黨人參加。”（三）“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工作，不是……為未來無產階級紅軍準備幹部，而是鞏固和加強（國民黨）軍隊”，為此，“應該取消軍隊中建立的共產黨支部。”而且“決不允許突出共產黨人，讓共產黨人佔據太重要的職位，試圖取代高級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斯大林是多麼害怕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領導權，因此再三強調中共要放棄獨立性和領導職位，捆綁共產黨人手腳，做國民黨附庸和苦力。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可查閱上述所提檔案資料。斯大林限制共產黨，而關心國民黨，扶植、武裝、縱容和鼓勵蔣介石，結果導致中國共產黨人和無產階級人頭落地，大革命失敗。這是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史上最可恥的幫兇。而更可恥的是他為了掩蓋自己的錯誤，推卸罪責，使用卑鄙手段將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在陳獨秀頭上。因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不存在的。

唐寶林研究員在《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紀實》中指出：“加給陳獨秀的托陳取消派、反共、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革命、叛徒六項罪名都是因為他與托派相結合。陳獨秀出任托派

回憶

中央領導人期間，曾領導托派進行過許多重大的“反蔣抗日”革命行動；抗戰爆發後，也做過許多抗日工作。托派與共產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對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托派及陳獨秀認為革命應該像歐洲那樣，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不能離開城市，離開工人階級而到農村去與農民相結合；否則共產黨就會農民意識化，革命就會像農民起義那樣沒有勝利希望。這在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和策略上沒有錯，只是運用到中國實際時成了教條主義，自然是錯誤的。這個錯誤的性質是陣營內部的路線分歧，不應定為“反革命”。而聯繫到中共勝利至今的歷史，也很難說陳獨秀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的注釋：“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承認了托派不是間諜、漢奸。而對於這起斯大林指使王明、康生捏造事實、造謠中傷、影響非常惡劣的嚴重政治事件，用“流行著”來推脫罪責，未免不夠嚴肅了吧？

所謂“托陳取消派、反共、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革命、叛徒”，實際上是陳獨秀反對斯大林的右傾錯誤路線，堅持無產階級革命主場反而受到的誣陷。2001年中共中央黨校組織全國著名學者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程》成了繼上海黨史研究室編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之後又一部放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傳統錯誤觀念的權威著作。經過中央書記

處五位書記審批，中共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吸收學術界研究成果，承認“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國際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並不真正瞭解中國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指示，作出了一些錯誤主意”；“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在黨內占了上風”。在三十年“為陳獨秀正名”運動的壓力下，中共高層通過各種方式，終於悄悄地放棄原來加于陳獨秀的“十宗罪”。

2007年陳鏡林和陳良初、黃公演參加南京奚金芳牽頭舉辦的陳獨秀研究會期間，與會的日本代表東京大學著名教授、日本陳研會會長佐佐木和慶應義塾大學著名教授、日本陳研會事務長長堀祐造與他們三人進行交流，邀請他們到日本研討參觀。當年9月4日由北京陳研會會長唐寶林率領代表團一行起程去日本。佐佐木教授、長堀祐造教授和日本大學中國語教授、陳研會會員山口守親自到成田機場迎接。先到日本最著名的名勝風景箱根休息參觀了兩天。該地整個是溫泉區，濃蔭綠樹，空氣清新，孫中山和魯迅都曾到此遊覽、居住。

9月7日在東京大學和9月9日在慶應大學特意为代表團舉辦了兩場陳獨秀學術討論會。中方代表唐寶林團長作了《陳獨秀和日本》的學術演講，論述了陳獨秀受中日甲午戰爭和日本參

加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國被打敗的刺激，尋求救國道路，五次留學日本。直至日本軍國主義長期對華侵略戰爭最嚴重關頭的1942年去世，日本對陳獨秀一生榮辱，有極其深刻的影響，產生持續一生的強烈的救國救亡的愛國主義情思；他也從日本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介紹的西方民主思想和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中獲取救國救亡之路的啟蒙和知識。其他三位代表，陳良初作了《陳獨秀早期思想的演進》，黃公演作了《陳獨秀晚年與托派》，陳鏡林作了《陳獨秀思想的三次飛躍》學術演講。

四人演講結束後，日本學者評述、提問、互相討論，氣氛十分熱烈。特別值得提出的提問是：“陳獨秀後期與托派結合，其基本主張是反蔣抗日，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統治；後來又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日，擁護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統一戰線。這些主張與共產黨沒有區別，為什麼把他說成是漢奸、反革命、叛徒？”答：“托派的基本主張之一是黨內要有民主、容許反對派合法存在；在黨外，容許反對黨合法存在。而斯大林不容許這兩個存在。陳獨秀問題的要害就在這裡，儘管他許多政治主張和活動與中共是一樣的，但由於陳公開反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瞎指揮，所以中共其他幾次路線錯誤的領導人，雖然也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犯了錯誤，也曾受過“替罪羊”式的處理，但沒有受到像陳獨秀那樣嚴重的打擊，像被冤枉扣上漢奸、反革命、叛徒等帽子。這種情況，生活在像你們這樣“兩個允許”的國家中的人，是很難理解的。”

由於在代表團到達前日方已在報紙上刊登了討論會的消息，所以參加這次學術討論會的各方來賓十分踴躍，還有多家新聞社記者到場。日方以這四篇演講的論文為中心，出版日文版專輯。佐佐木教授曾發表過多篇論文，把陳獨秀的思想和活動，放在亞洲和世界科學史上，與其他世界偉人進行比較論述，給予高度評價。把陳獨秀和伽利略、馬基雅維利、福澤諭吉並列，稱為世界民主和科學史上的四大偉人之一。會後日方還安排了四天參觀考察。這次中國陳研會代表團訪日受到日方如此高規格熱情接待，深切表明日本友人、陳研會學者對中國陳獨秀研究的高度重視。

回顧陳鏡林一生的思想發展軌跡，從少年時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地主及兩千多年來的封建道統的守舊思維，到青年時期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買辦國民黨蔣介石一黨專政的反動統治，再提升到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高度。晚年的他仍一直關注和思考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金融化、資訊化和人工智慧化的演化，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日趨劇烈，無產階級革命需求和革命動力問題更加突出，他堅信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前景一片光明。

2020年12月23日於紅楓山莊

陳獨秀為何主動成為托派分子(轉載)

棠棣

一、什麼是托派？

1924年列寧去世後，聯共(布)內在蘇聯經濟建設、對外政策、黨內民主等方面的爭論日漸激烈，先後出現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派。到1926年春夏，這兩派結合形成了“托季聯盟”，共同反對斯大林的內外政策。

為了對付反對派的攻擊，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的多數派以聯共(布)十大關於維護黨內統一的決議為武器，運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的權力，於1926年7月將季諾維也夫開除出中央政治局；10月撤銷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同時解除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的職務。1927年11月，又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等開除出黨。後來，由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公開表示悔過，才於1928年得以恢復黨籍。

托洛茨基由於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於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圖。在流放地，托洛茨基與各國反對派分子建立了聯繫，繼續批評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政策。1929年1月，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決定把托洛茨基驅逐出境。

在托洛茨基反對派與斯大林多數派的諸多爭論中，中國問題是其中的主要內容之一。在大革命失敗前，雙方爭論的問題主要是：共產黨人要不要退出國民黨、要不要支持蔣介石的軍事行動等。在大革命失敗後，雙方爭論的問題主要是：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責任，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的革命性質、任務等等。

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即提出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的建議。同年7月，他們再次提出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從中國召回加拉罕、移交中長鐵路給中國政府等主張。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托洛茨基曾警告：要警惕國民黨的右轉。然而這些建議均遭到斯大林多數派的嚴厲譴責。

在1927年5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上，托洛茨基等人堅決反駁了斯大林等人為其中國政策所作的辯護，堅決反對依靠武漢政府，認為這將重演“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他們提出要維護共產黨的獨立性，成立蘇維埃政權，建立工農武裝。這些主張再次遭到了斯大林多數派的斥責和嘲笑。

大革命失敗後，托洛茨基猛烈抨擊斯大林等人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提出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應該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責，認為正是他們的“機會主義路線”造成了大革命的失敗，而中國共產黨只是斯大林政策的受害者。

聯共(布)內的爭論和鬥爭，自然影響到當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大學、列寧學院等學校學習的中國學生。一些在國內經歷了大革命風雨和飽受大革命失敗痛苦的學生，瞭解到托洛茨基派與斯大林派爭論的具體內容後，十分贊成托派(托洛茨基反對派，後同)的見解，特別是在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上，他們對斯大林等人諉過於人，堅持自己一貫正確的做法非常反感。

托派成員王文元回憶說：

關於中國革命的爭論，我幾乎是直覺地同意了反對派……過去，我早就有了一些懷疑的，第一，是我們在北方(南方的情形我不甚清楚)硬替國民黨發展組織，我從來就覺得可笑；第二為什麼我始終把希望寄託在高級軍人和政客身上，受了一次騙又自願地為另一個騙子去效勞？第三，為什麼要把武漢工人的槍械繳給唐生智？為什麼要壓制湖南農民的

“過火”行動?這些懷疑,我最初只是茫然惶然;後來聽說這都是陳獨秀犯的錯誤,是違背了國際指令的。可是今天,在那些精心編輯過的討論檔中,我卻終於看到:無論鮑羅廷,無論陳獨秀或印度人羅易,都不過是政策的執行者,真正決策者乃是聯共的中央,是斯大林。

在中央派主張的所謂完全正確的政策,與我們在國內見到的所謂被執行錯了的政策之間,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倒是隱隱約約透露出來的,斷章取義引來的反對派的表面上非常荒謬的論據,根本和國內所曾實行的政策不同。

這樣,在蘇聯學習的中國學生中,有一批人不顧可能遭受斯大林多數派打擊的危險,從思想上和感情上開始傾向於托洛茨基反對派,還有人秘密參加了反對派。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紅場舉行紀念十月革命勝利十周年遊行集會,斯大林等蘇聯高級黨政軍領導人站在主席臺上檢閱隊伍。當中山大學的遊行隊伍走到紅場入口處時,隊伍中的托派學生突然從口袋裏掏出事前準備好的旗子揮舞著,呼喊著反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頃刻間,擁護斯大林的學生與托派學生便扭打起來。然而,緊接著的隊伍中又有人打出寫有“執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旗子,還有人大聲呼喊,聲援隊伍前面被圍攻的托派學生。

在斯大林與托派鬥爭十分激烈的當口,紅場事件使雙方的鬥爭達到白熱化程度,從而也促使斯大林加快了處置托派的步驟。托洛茨基先是被開除出黨,後被流放;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也被開除出黨。而在紅場事件中向斯大林發難的中國托派學生,則全部被開除黨籍或團籍,除少數人被流放到南俄靠近伊朗的邊界服苦役外,大多數人於1927年底被遣送回國。

斯大林沒有料到的是,這些被遣送回國的托派學生非但沒有停止活動,反而將托派主張和觀

點帶回中國,並感染了一批人,最終導致在中國也出現了托派組織。

1928年12月,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在上海建立。這個托派組織的領導機構為“全國總幹事會”,史唐、陸一淵、張特、梁幹喬、區芳、陳亦謀、宋逢春、蕭冰洋、李梅五、徐正庵等為托派中央和各區負責人。

這個托派組織成立之後,便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創辦地下刊物《我們的話》,也創辦了一個同名的油印刊物,作為宣傳托洛茨基理論的機關刊物。由此,這個托派組織也被稱為“我們的話派”。

托派組織以上海為中心的活動,尤其是《我們的話》的刊印,使托洛茨基關於革命的一些觀點開始在非托派組織人士中傳播,而且產生了強烈的衝擊效果。鄭超麟回憶說,當他第一次從尹寬那裏看到油印得並不清晰的托洛茨基的文章時,仿佛有什麼電光閃過他的頭腦,他昏亂了,一時間竟判斷不出文章中的話是對是錯。但他最終還是被托洛茨基吸引住了。

“我們的話派”不僅將自己的刊物在上海等地傳播,而且還通過關係拿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散發。甚至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等學校中,也有《我們的話》在流傳。

1929年6月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收到了從中山大學截獲的《我們的話》,這一情況引起書記處副主任米夫的高度重視,他隨後給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寫了一信,指出:“中國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產黨人中間,在共產黨內部有隱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並將黨的全部檔轉給公開的托洛茨基分子……請速告,為克服托洛茨基主義危險,黨在做什麼工作。”

此時,遠東局和中共中央領導人也已經注意到了中國托派分子的活動。他們認為,受托洛茨基理論影響的,是一些理論水準不高,又不瞭解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人。鑒於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已經將托洛茨基反對派定性為“國際帝國主義進攻蘇

聯和反對共產國際的工具”，並開展了對反對派的嚴厲打擊和批判，遠東局便要求中共中央密切注意中國托派的動向，以便隨時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堅決肅清反對派的一切企圖。

1929年6月20日至7月1日，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在上海召開。遠東局成員參加了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綱要》中專門談到托派反對派問題，提出要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

二、陳獨秀為何主動成為托派分子？

1929年5月，陳獨秀從歸國學生王平一手裏，拿到從蘇聯帶回國的一些托派資料，其中有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等文章。認真看過後，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觸動。但是，陳獨秀畢竟是一個受過政治風雨磨煉的人，尤其是大革命失敗後又遭受到巨大的精神壓力，所以他對是否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張，還是持十分謹慎的態度，經過了一個比較長時間的複雜的思想鬥爭過程。

對此，鄭超麟有如下回憶：

我們並非一下子就接受托洛茨基主張的。就我個人來說，我經過了多次考慮，多次討論，然後同意這個主張。問題牽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複雜！抵抗最長久的是陳獨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寬談話，都提出不同意見，經過尹寬解答後，還是不同意，但下次談話，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見了，反而以尹寬的意見(即托洛茨基的意見)為基礎，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見。如此一層又一層的討論下去。到了我們其餘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時，他個人還有不同意見。

然而，陳獨秀最終還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張。陳獨秀作出這一選擇，是有思想基礎的，這就是他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推卸責任的不滿。自從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一直在反省之中。他覺得自己身為中共中央領導人，自然對大革命失敗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但他認為，莫斯科方面也有責任，是它將共產黨與國民黨綁在一起，並且一直不同意退出國民黨，結果使共產黨失去了自主權，被動地受制於國民黨。然而莫斯科不是誠懇地檢討自己的失誤，而是採取了諉過於人的做法，將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到中國共產黨人身上。而中共中央因受共產國際的掌控，所以不得不把責任全部攬下。

感到孤掌難鳴的陳獨秀，看到托洛茨基的文章後，終於找到了知音。他驚喜地發現，早在大革命時期，托派茨基就反對過國共黨內合作，主張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這與他自己當時的主張完全是不謀而合！而托洛茨基所總結的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尤其是對斯大林派的譴責，也正好是說出了他的心裏話！陳獨秀不由得從思想上和感情上貼近了托洛茨基。他在後來曾毫不顧忌地告訴共產國際領導人：

因為你們的蒙蔽與封鎖，直到半年前，我們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關於中國問題及一切蘇聯問題的檔。從此以後，我們才徹底地系統地瞭解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是真正的根源所在。當你們將革命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時，而托洛茨基同志卻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也並且預言這種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必然遭到的結果。

8月5日，陳獨秀又提起筆來，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信。這是他在接受托洛茨基派理論後，向中央全面闡述自己思想觀點的一封信。在信中，陳獨秀反思了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八七會議”後黨的失誤以及目前黨的政策存在的問題，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關於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陳獨秀認為：

是因為黨整個的根本政策是機會主義的。而產生機會主義政策的根由，乃是因為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之錯誤的觀察，遂至不自

覺地削弱了無產階級的力量，過分助長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勢力，造成了大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勝利之前提。

關於中國革命當前的形勢。陳獨秀分析說：

“八七會議”後的臨時中央，由於不能勇敢地承認革命之失敗及資產階級之勝利這個既成事實，沒有採取退守的政策，反而在主觀上肯定革命高潮還正在一直高漲，因此採取了直接進攻政策，使得敵人得著機會，用各個擊破的方法，在全國範圍內把我們整個的階級力量打得粉碎，黨中最積極的戰士因之喪失殆盡。

據此，陳獨秀指責：

當廣州暴動前後，我感覺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錯誤的估量，遂至有錯誤的政策，曾寫了幾封不避忌諱的信給中央，指出國民黨政權決不會像你們所估計那樣快的崩潰，群眾的革命情緒也不像你們所估量的那樣高昂，並且我們已失了和廣大群眾的聯繫；若不馬上改變政策，從群眾自身的日常生活鬥爭中獲得廣大的群眾，若不估計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情緒到了若何程度，而隨便暴動，其必然失敗的結果，只有使群眾更加離開我們，甚至於怨恨我們而接受反動派的宣傳。當時的中央對於我的意見，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當做笑話到處宣傳……現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經改正了這些錯誤呢？我以為一點也沒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未曾改正，向右的機會主義根本上也同時存在。

陳獨秀在信中特別提到黨內民主問題，強調民主對於黨組織的極端重要性，並指責中共中央聽不得不同意見。他說：

同志間關於理論上政策上意見不同的爭論，是黨的進步的現象，決不是壞現象；反之，

大家都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這正是黨之幼稚的表現，爭論之結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會為大眾所公認；錯誤的意見，一經公開的被大眾批駁下去，以後才不至隱藏在黨內，遇著機會便要發作出來……如果你們老是固執著你們的褊狹性，而不顧及黨內德謨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見如蛇蠍，而企圖用中央威權霸蠻地造成你們意見的一致，對於不同的意見，禁止討論，或消極地不在黨報上公表出來，一聽到同志中和你們有不同意見，不管他的內容如何，便簡單地用“小資產階級觀念”“非無產階級意識”。

“觀念不正確”如此等類沒有內容的抽象名詞來排斥他；更或者給他戴上一頂帽子，如“反對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來鎮壓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免開尊口；這便是有意地或無意地阻住了黨的進步。

在信的末尾，陳獨秀說明寫這封信的目的：因為我不忍眼見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就這樣長期地在不正確的路線之下，破滅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來慎重考察的結論，寫這封信貢獻於你們，希望你們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狹性，平心靜氣地把我的意見詳細審查一下；並希望把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

這一次，中共中央並沒有如陳獨秀所願，將他的信刊登出來。但在中共中央於8月13日發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號》中，將反對中國的托派的鬥爭和反對黨內機會主義殘餘的鬥爭聯繫起來，並且明確指出了機會主義與托派的關係。

《通告》說：

現在中國機會主義思想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見解，正憑藉著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與他一無二樣地來反對現實黨的正確路線，企圖掩蓋過去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故在現時中

國黨內鬥爭的路線一方面是反對反對派的鬥爭，一方面必須努力於肅清機會主義殘餘的鬥爭，且機會主義復活的企圖在中國黨內更有他的歷史殘留的根據，中國黨內的托洛茨基反對派又必然要利用這一鬥爭，以便掩藏在黨的組織之內，來擴大他自己的活動範圍。因此我黨在無產階級最高原則之下，必須堅決地反對黨內任何小組組織的活動，反對機會主義殘留的復活，以肅清黨內各種不正確的思想，以消滅反對派所能利用的黨內基礎。

《通告》中沒有點陳獨秀的名字，但明眼人完全可以看出來，中央所說的“黨內機會主義殘餘”，就是陳獨秀及其追隨者。難怪中央沒有將他的信刊登出來，因為此時中央已不再將陳獨秀作為可以平等討論問題的同志，而是將他作為與托派結合的黨內機會主義的殘餘了。

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認為在黨內目前存在兩個較為嚴重的問題：“第一是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活動；第二是獨秀同志之不同的政治意見的發表。”

信中認為，陳獨秀給中央的幾封信，決不是偶然的，他一向認定中央是一貫的盲動主義者，殊不知他卻永遠站在機會主義的觀點上來觀察中央的正確路線。

對於陳獨秀8月5日給中央的信，中央說：“陳獨秀的見解已證明他由機會主義走到了取消主義——顯然與托洛茨基反對派，對中國革命問題的取消觀念無二致，借此來反對黨現時的正確路線，來掩蓋他過去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8月28日，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和中共中央領導人找到陳獨秀。談話中，遠東局指出中央的政治路線沒有原則上的錯誤，批評陳獨秀不應該發表與中央不同的意見。中央領導人則解釋說，由於時局緊張，中央不能公佈他8月5日致中央的信。至於談話的其他細節，陳獨秀後來在給中央的另一

封信中有這樣的表述：

談話時，一切重要的政治問題都拒絕討論，單純地責備我不應該向中央發表不同的意見，堅決地說中央絕對不允許把我的信公佈出來，並且堅決地說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上的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任何同志都不許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國際代表用這樣的專橫態度來掩護錯誤，用這樣不合理論不合事實的藉口來阻止中國黨內政治問題所急需的公開討論，我不責備這位代表，我只感到真如反對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國際領導機關在政治上組織上官僚化之一證。最後，你們還拿出開除黨籍的話來威嚇我，阻止我發表意見。

9月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負責人米夫和庫丘莫夫致信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再次詢問中共中央對托派的態度，提出“無論如何不能讓托派組織發展”。信中指示：“採取揭露和徹底消滅托派的各種措施時(中國黨還不大想像得到托派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還是要十分清楚地提出這個問題：現在在黨內右的危險是主要危險……黨內必須加強同右派的鬥爭。”

在信的末尾，米夫和庫丘莫夫嚴厲地指出：“建議(以中央決定的形式)陳獨秀立即就黨的策略問題作出表態。繼續不明確態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許的。必須要麼爭取使他在徹底承認錯誤和接受黨的路線的基礎上實際參加黨的工作，要麼決定他的黨籍問題。”

陳獨秀沒有接受中央的任何勸告，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而在中共中央與莫斯科往來的檔中，陳獨秀的名字從此便較多地與“托派取消派”、“取消派”、“取消主義”等連在了一起。這樣一來，陳獨秀在黨內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羅莎·盧森堡生活和思想裏的革命民主挑戰

保羅·雷·布蘭克



羅莎·盧森堡的生命和智慧照亮了人類經驗，激勵了很多尋求一個更美好世界的人。她對一些重要事項的許多見解和傾向，似乎讓她領先於某些合作的或部分合作的思想家，這些思想家像她一樣，對馬克思主義傳統也是重要的——無論是考茨基，或列寧，或托洛茨基。我認為，她的先進在於她談論自然世界方式，在於她與這個地球上其他動物的親情感覺，在於她的公開和深入的接觸人的尊嚴和人的苦難，在於她對詞語往往是明慧的構思和創造，也在於她精彩的幽默中。她的著作令人難以置信地活躍。[1]

1919年盧森堡被右翼行刑隊殺害後，布萊希特曾經為她寫了一首詩：

紅色羅莎今已逝。葬身之處隱沒世。她讓窮人知窮因。富者故而抹煞伊。[2]

然而，一而再，再而三，由於她的死，紅色羅莎的精神和思想回歸了。可是在我們自己的

時代，尤其是與20世紀的最後十年裏，有新的和令人難以置信的強大努力，要抹煞羅莎·盧森堡，這是精心策劃的努力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支有用於理解和改變世界的力量，該努力的目的是要讓馬克思主義本身同羅莎·盧森堡一起消失。

使這個優秀同志活過來的唯一辦法，是拒絕滿足於簡單的“尊重她的懷念”，或詳解她的想法，就像我們把蝴蝶屍體放在一個玻璃盒裏那樣。相反，我們必須接受——盡可能批判地和誠實地——她的思想對我們自己時代的挑戰。這一挑戰（尤其是革命民主的挑戰）尖銳地關係到的所有國家，從俄羅斯到波蘭，從德國到美國，從日本到中國到印度，從南非到古巴到巴西。在同我們當代的壓迫現實作鬥爭時，羅莎·盧森堡和革命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吸收到我們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中，在這個意義上說，羅莎·盧森堡和革命馬克思主義仍活著。

盧森堡的立場，對今天關於馬克思主義和民主兩者非常普遍的一些虛假觀念，是一個強大的挑戰。在當今世界最強大，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中，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告訴我們，市場經濟和民主（即資本主義和人民治理）歷史上自然地攜手發展，任何時間，兩者都缺一不可。如果羅莎·盧森堡人今天在這裏，她會精闢地和有說服力地駁斥說——就像她在她的時代所作的那樣——這是一個謊言。還有親資本主義宣傳分子以及所有過分自詡的共產黨人宣揚的神話，即社會主義是通過專制措施帶來的東西。

我們應該處理這兩個神話，一時處理一個。

市場經濟的自然發展，資本主義（不論一個人是否以某種正面或“進步”的方式看待）的自然發展無疑是獨斷獨行的。資本主義基於經濟力量的不平等，而且進一步增強了經濟力量的不平等，從而自然地產生政治權力的不平等。沒有比資本主義工廠更專制的，其職能是設法剝削大量工人，而且這完全無關於該專制取的是殘酷的還是善良的態勢。而且資本主義市場的主要職能並不是滿足大多數人民的（消費者）需要，而是要把擁有和控制經濟的少數人的利潤最大化。[3]

如果她在這裏，盧森堡也會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中歐和東歐——德國、波蘭和俄羅斯——資本主義發展的實際動力學上，對於這些地方她是如此熟悉。在那裏，在大多數情況下，資產階級對他們上面精英的親情感受大於對其下面群眾的，他們服從和交織於傳統的精英，而精英則傾向於維持權威主義作為政治架構，在這個架構裏允許市場經濟和工業現代化蓬勃發展。[4]

紅色羅莎會向我們指出——就像她在她的時代所作的那樣——民主的推進，只有通過日益增加的工人階級大多數的鬥爭，通過勞動人民的自我組織，通過社會和政治改革群眾運動，通過強有力的獨立的和民主的工會，通過民主的群眾工人階級政黨來達成。從歷史上看，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的正常運作，而是工人階級運動和其盟友的群眾壓力和鬥爭，一步一步地，為民主權利，民主改革和民主政治結構的擴大鋪平了道路。[5]

在同一時間內，盧森堡堅持認為，資本主義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即資本主義市場和資產階級按多種方式的自然運作會導致限制、操縱、貪污和腐敗的增加，從而侵蝕工人階級的所得並

且防止（必定始終防止）充分民主的社會開花結果。在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裏有一些流派，否認或忘記資本主義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她過去是嚴厲批評的（現在也應是這樣的）。

盧森堡還觀察到——並且精闢分析過——資本主義強大的擴張主義傾向。這些傾向導致對全球越來越多地區的人侵，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利益，侵犯無數人民的文化，生活品質和自決權，因為資本主義企業被驅迫要獲取日益擴大的市場和原料及投資機會。這個全球資本積累的專制過程，也就是帝國主義，依賴於異常的軍事獨裁機器的擴張。正如盧森堡的正確預測，咄咄逼人的擴張主義和日益增長的軍國主義會引起暴力災難（殖民戰爭、世界戰爭等等），人民群眾要為富庶的強權精英的利益付出代價。她警告說，這些事態發展也可能旋轉得失去控制，並威脅文明本身的未來。[6]

針對這一專制暴力和死亡的勝利，盧森堡為社會主義道路激情奮鬥。在她看來，社會主義運動已被證明是世界上爭取民主最一貫的力量——這種看法，在最近幾年已得到相當多的有識而認真的歷史學家的支持。還有，她認為，社會主義很簡單，就是擴大深化和真實的民主——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兩方面，真正為人民的原則。她的工人國家（有時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同以人民名義實施統治的一黨專政無關。這意味著，談論勞動階級贏得民主鬥爭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上說的東西，談論勞動階層的徹底政治原則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上說的東西。這同威權政治形式形成對比，在1917俄國革命後，威權政治形式開始過快的發展。[7]

盧森堡是這方面發展的一個早期批評家，她挑戰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對他們她懷有崇

高的敬意——面對內部的反革命攻擊和全球資本主義的反攻，他們採納了不民主的緊急措施，這成了他們把這些措施作危險擴大的理由，盧森堡則要拉他們回頭。“自由僅對政府的支持者而言，只對一黨的成員而言——無論他們有多少——那就更本沒有自由可言”，她堅持說。“自由總是並且專門對不同看法者而言的。”她在其預言式警告中闡述：

沒有一般的選舉，沒有不受限制的新聞和集會自由，沒有一個為言論的自由鬥爭，每一個公共場所的生活在逐漸消失，成為一個生活假像而已，在其中只有官僚仍是活躍的因素。公共生活逐漸入睡，幾十個精力不竭和經驗無限的政黨領導人在指導統治。在現實中，他們中間只有十幾個優秀的頭腦做領導，一個工人階級的精英層時時被邀請與會，會上他們對領導人的發言鼓掌，並一致核准所提決議——實質上這只是一個小集團的事情——一種專政，可以肯定的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然而只是少數政客的專政... [8]

盧森堡也深刻批判她自己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不同的專制發展。黨內和工會領導內部一個日益強大的趨勢認為，改革的逐步積累——會無痛苦地抹掉資本主義最壞的特點——會是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一條更好的道路。盧森堡回應時表示，如同市場上一個人在辣香腸或不辣香腸之間作選擇一樣，選擇不同的路徑走向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她預言式地堅持，改革派的路徑完全不會逐步導向社會主義，而是逐步讓社會主義運動適應和屈從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專制陋習，殘酷現實和暴力。即使通過爭取改革的鬥爭，能為工人階級贏得至關重要的收益，這將是西西弗斯一樣的勞動——古希臘神話的強人，不停將一個沉重的巨石推上一個陡峭的山頭，僅僅是讓諸神把它再次滾下來。因此，資本主義

自然動力學會時時包抄和削弱工人運動贏得的改革。[9]

盧森堡認為，為了保持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的真實，並且為了捍衛工人和被壓迫者的物質利益，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即使在爭取必要的和恢復生機的部分改革時——有時會發現自己在不妥協地對抗資本主義的權力結構。然而，她和革命同志發現，就是她自己的社會主義勞動者運動中日益官僚化的結構正在成為該運動的內部民主的障礙。工會和黨的日益官僚保守的領導層，越來越多地遏制工人階級成員的激進衝動，以限制像盧森堡那樣的人展現革命社會主義觀點的能力，把階級鬥爭高潮轉移到安全溫和的管道上。他們尋求維持改革派的戰略，他們認真地相信那是更“實際”的，但是事實上，這是把勞工運動到結合進資本主義現狀的專制結構和災難性的方向。[10]



羅莎·盧森堡很清楚，人民的大多數——同工人階級那樣——絕不會一致或一貫地傾向於革命或社會主義的方向。她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和社會意識，令人難以置信的深刻而又多樣、

矛盾、飄忽和變化，在某一刻趨向一個方向，然後立刻又轉向一個非常不同的方向。資本主義發展的性質是壓迫的，有時是可怕的，但是，把關於階級鬥爭的明確可闡明的觀點同社會主義結合時，有時可能造成戲劇性的高潮——即她所調的群眾罷工，或群眾行動，往往會發生在勞工運動的現有結構以外。她部分看到，這一點在創建新的激進工會和其他的工人和受壓迫者組織上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其含意更進一步。盧森堡沒有意思要否認現有工會和德國議會的社會主義代表選票的日常工作的重要。但能真正達到社會主義的運動必須超越這一點。她相信，重要的是：發現廣泛的可能性，讓越來越多的人參與行動，參與加深他們自己的理解和義務以及技能的經歷，這將增強他們自己的信心和創造力，以及他們為革命事業激勵和贏得越來越多工人的能力。[11]

而且，作為一個革命戰略家，這樣的認識對於她是重要的，把她同德國社會民主黨主要的領導區分開來。對於所謂的“議會外”社會鬥爭，以及現有組織和自發群眾行動之間的動態相互作用，盧森堡相當重視。這使得她的少數革命同志害怕。她這樣說：

作為與生俱來的議會愚侏病弟子，這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已經尋求把議會苗圃國產化的智慧運用於革命：要做任何事，您必須先有一個大多數。他們說，這同樣適用於革命：首先讓我們成為一個“多數”。不過，真正的革命辯證法，站在這智慧的頭上：不是通過大多數到達革命戰術，而是通過革命戰術達到大多數——這就是這條路的走法。就是說，只有知道如何帶頭的黨，才能在暴風時代推進事業，贏得支持。[12]

對於盧森堡，該革命民主的戰略眼光和她關

於社會主義的革命-民主視野之間有顯著的一致性。她提出如下：

資產階級的統治不需要整個人民的政治培訓和教育，至少不要超越某些狹隘嚴苛的限制。但對於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生命的元素，真正的空氣，沒有就無法生存。只有經驗能夠糾正和開啟新的途徑。……整體人民必須參加。……只有暢通，歡騰的生活落入一千個新形式裏和即興發揮的作品中，才能揭示創造性力量，本身就會糾正所有錯誤的嘗試。……生活裏的社會主義要求人民群眾的完全的精神轉化，數百年的階級統治已造成了民眾的退化。社會本能代替自私自利，群眾主動代替墮性，征服所有痛苦的理想主義。……唯一的重生出路，是公共生活學校本身，是最無限制的，最廣泛的民主和民意。[13]

顯而易見，羅莎·盧森堡認定的這種真正的民主，不能通過有能力的領袖，通過善意的革命精英，通過一黨專政，通過勞工官僚機構，通過巨大商業利益資助的浮華競選，當然也不能通過外部強權的軍事入侵，賜予人民。只有通過經驗的積累和不懈奮鬥，成熟的活動家和民主組織的擴展，以及隨之而來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勞動者本身的覺悟和革命民主的參與意識的崛起，才能達成。[14]

當然，如同我們自己一樣的人民，必須面對這個棘手問題，即我們是否願意幫助推動這個過程，如果是的話，又如何去做。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2006年9月23日，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1124>

注釋

[1] 馬克思主義傳統探索，其中關於盧森堡的部分，來自于保羅·雷·布蘭克：‘從馬克思到葛蘭西，一位革命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讀者’（大西洋高地，新澤西州：人文出版社，1996年），以及保羅·雷布蘭克的進一步闡述：‘羅莎·盧森堡，思考和寫作’（阿姆赫斯特，紐約：人文叢書，1999年）。該問題和有關事項的關鍵文章是保羅·弗羅利什的‘羅莎·盧森堡，她的生活和工作’（紐約：每月評論，1972年）和諾曼·赫拉斯的‘羅莎·盧森堡的遺產’（倫敦：反面，1983年）。最近期的盧森堡著作的英語文選，也非常值得參考——羅莎·盧森堡讀者，彼得·哈迪斯和凱文·B·安德森編輯（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2004年）。

[2] 引述在溫蒂·福里斯特：羅莎·盧森堡（倫敦：哈麥·漢密爾頓，1989年），61頁。

[3] 例如，參見羅莎·盧森堡的“什麼是經濟學？”，羅莎·盧森堡的講話，瑪麗-愛麗絲·沃托斯編輯（紐約：探路出版社，1970），220-249頁。

[4] 與此有關的是阿諾·J·邁爾的‘舊制度的持續：邁向大戰的歐洲’（紐約：眾神叢書，1981年），和彼得·訥特爾的‘羅莎·盧森堡’，刪節版（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69年），72-74，304-305頁。

[5] 馬克思主義民主的中心地位，已經建立好了一段時間，例如參見邁克爾·婁武的‘青年馬克思的革命理論’（芝加哥：Haymarket叢書，2005年），理查·N·亨特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卷2。（匹茲堡：匹茲堡大學出版社，1974年，1984年），以及小奧古斯特·H·尼姆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對民主突破的貢獻’（奧爾巴尼：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2000年）。關於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推進民主的政治運動的中心地位，見迪特裡希·儒謝梅爾，伊維林·胡貝爾·斯蒂芬斯和約翰·斯蒂芬斯的‘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2年）以及傑夫·厄雷的‘鍛造民主：1850年至2000年歐洲左派史’（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6]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倫敦：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1年），和“朱尼厄斯小冊子：危機和德國社會民主”，羅莎·盧森堡的講話，261-331頁。

[7] 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勒·勃朗峰，從馬克思到葛蘭西，143頁；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國家與革命”，選集，第二卷（紐約：國際出版社，1967），343-345頁）。

[8] “俄國革命”，羅莎·盧森堡的講話，389，391頁。

[9] 關於香腸和西西弗斯的論點，可以發現於盧森堡的“改革或革命”，羅莎·盧森堡的講話，71，77頁。她對社會民主黨領導層方向的日益增長的批判，可見於‘羅莎盧森堡的講話’裡的“群眾罷工，政黨和工會”，155-218頁，在勒·勃朗峰裡的“理論與實踐”摘錄，羅莎·盧森堡，139-174頁（略有不同的摘錄見於‘羅莎盧森堡的讀者’，208-231頁），見於斯蒂芬·厄里克·布朗納編輯的書信，羅莎·盧森堡書信，第二版（大西洋高地，新澤西州：人文出版社，1993），129，149，179，294-295。

[10] 見卡爾·肖斯科，1905年至1917年德國社會民主：大分裂的發展（紐約：維雷出版社，1955）。

[11] 這些見解在上面註腳[9]引用的來源中以及在盧森堡的“在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講話”裡已經闡述了，羅莎·盧森堡的講話，405-427頁。

[12] “俄國革命”，羅莎盧森堡的講話，374頁。

[13] 同上，389-391頁。也見於“社會的社會主義化”，羅莎·盧森堡的讀者，346-348頁。

[14] 最近推動這個方向的一個努力，是晚近丹尼爾·辛格的最後工作：誰的千禧年？他們的還是我們的？（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99年）。另一個可以在伊維林·偉提奇，保羅·雷布蘭克，奧塔卡·路班湯瑪斯和琳賽·考林在學者及活動家會議上的材料裏發現，會議由南非反戰運動和羅莎·盧森堡基金會約翰尼斯堡辦公室舉辦——軍國主義和戰爭：2004年羅莎·盧森堡政治教育研討會（南非約翰尼斯堡：坎亞學院出版社，2005年）。

Full Abolition of Nuclear Power to Overcome Social Anxiety

Po Mi

Xu Jingbo, the president of Asia News Agency, pointed out that 10 years after the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in Japan,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delay in dealing with it was that the radiation level near the bottom of the furnace exceeded the limit of what was acceptable to human beings. In other words, human beings cannot get close to it. Meanwhile, due to the explosion, the bottom part of the nuclear reactor has been destroyed. Even if robots were to enter the bottom of the furnace, first of all, it was necessary to remove all the roadblocks, cut the atomic furnace, and develop and manufacture robots with professional skills. In addition, the fuel rods were sunk into the bottom of the furnace, but must be constantly cooled with cooling water, thus generating a large amount of contaminated water every day. The treated "nuclear wastewater" is continuously stockpiled in large, custom-made steel tanks. Now there are around 1,000 tanks with over 1.2 million tons of radioactive effluent. In two years, there will be no more space for any steel tanks.

On March 10, 2021, the Japan Atomic Power Regulatory Commission announced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plant accident. It stated that serious contamination was found above the reactor plants. A concrete cover called a "shield plug" was located above the No. 2 and No. 3 units where a total of 7 trillion becquerels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might be attached. This is equivalent to 10% of the radioactive material in the three reactors of Unit 1, 2 and 3, which suffered core meltdowns in the nuclear leak a decade ago.

So far, Ukraine and Japan have been unable to solve the two major nuclear accidents of Chernobyl and Fukushima. They are completely helpless. Instead of giving up on nuclear power, China has been vigorously develop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along its coast areas, which is indeed a frightening sight!

By the end of 2019, China had 47 nuclear power units in operation, with a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of 48.75 million kilowatts, ranking third in the world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In 2019, three nuclear power units were in commercial operation in China, namely Haiyang Nuclear Power 2, Yangjiang Nuclear Power 6, and Taishan Nuclear Power 2. The installed capacity of nuclear power accounted for 2.42% of the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of electricity in China in 2019. Although nuclear power accounts for only 4.88% of the country's total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t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that a single accident will not only destroy everything, but also leave a string of disaster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o come.

On March 6, 2021, there was a nuclear accident at Unit 2 of Haiyang Nuclear Power Plant. The State Nuclear Safety Administration stated that there were "no radiological consequences, no personnel exposure, and no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and Radiological Event Classification Manual, it was defined as Level 0 incidents, i.e., incidents of "no safety significance".

However, the public cannot put 100% trust in the safety of nuclear power. People are always afraid, not of ‘what’, but ‘what if’.

Learning from Fukushima’s lesson, Germany has already adopted a policy to abandon nuclear energy. Germany accounts for six of the world’s top ten safest nuclear power plants. Germany was densely populated with nuclear power stations and became one of the largest net exporters of electricity in Europe. However, after news of the nuclear disaster in Japan reached Europe on March 11, 2011,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Germans staged a demonstration demanding that the government abandon the nuclear power plants. After nearly 12 hours of heated arguments and discussions, the German ruling party finally decided to shut down all 17 nuclear power stations in the country by 2022 and completely abolish nuclear power. On March 5, 2021, the German government announced a compensation of 2.4 billion euros for German companies that withdraw from the nuclear power industry.

On March 11, 2021,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five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Naoto Kan (2010-2011), Yukio Hatoyama (2009-2010), Junichiro Koizumi (2001-2006), Tomiichi Murayama (1994-1996), and Morihiro Hosokawa (1993-1994), jointly issued a “Zero Nuclear Power” declaration calling on the current government to change its nuclear power policy.

Junichiro Koizumi gave a speech at a meeting held at the Constitution Memorial Hall, criticizing that the argument that nuclear power was natural, low-cost, and clean energy were “all lies” and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party on the issue of nuclear power, which is a problem that endangers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and the country’s economy. If we can’t solve the problem, we have to abandon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Naoto Kan also pointed out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 nuclear power plants have produced only 3 percent of the total amount of electricity, while the construction costs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have tripled, and the used fuel cannot be disposed of.

Ten years ago, He Zouxu,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cademician, remarked: “Once a nuclear accident occurs, it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how many people die, but how many generations will be affected. The Chernobyl accident created an extensive no-man’s land, and the Fukushima accident this year is unavoidable. Nuclear material will be activ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will be a great burden to humanity.”

The only way to overcome social anxiety is to have zero nuclear power.

Reference:

- (1)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448487>
- (2) https://www.sohu.com/a/454561521_121040412
- (3) http://xn--fiqs8s1vd653b033a.xn--fiqs8s/xw/zjzd/201105/t20110526_3142587.shtml
- (4)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36147
- (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641235
- (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620343
- (7)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2FaiJL7Nve>
- (8)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676832
- (9) <https://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300/201214-a4052bd0.html>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2021年3月19日出版

香港 2 住房負擔沉重 基層居無可安.....張劍

中國 4 全面廢核 解除疑慮.....破謎

國際 7 應對資本主義的多重危機必須徵用銀行.....埃里克·圖桑

11 印度與殖民地債務.....蘇紹萬·達爾

回憶 16 悼念陳鏡林.....楊林

歷史 24 陳獨秀為何主動成為托派分子(轉載).....棠棣

理論 29 羅莎·盧森堡生活和思想裏的革命民主挑戰羅·雷·布蘭克

英譯 34 Full Abolition of Nuclear Power to Overcome Social Anxiety.....Po Mi

OCTOBER REVIEW VOL. 47 ISSUE 3 2021.3.19

Hong Kong

2 Heavy Housing Costs Burden on the Grassroots.....Zhang Jian

China

4 Full Abolition of Nuclear Power to Overcome Social Anxiety.....Po Mi

International

7 To Confront Capitalism' s Multifaceted Crisis the Bankers Must Be Expropriated and the Banks Socialized.....Éric Toussaint

11 India and the Colonial Debt.....Sushovan Dhar

Memory

16 In Memory of Chen Jinglin.....Yang Lin

History

24 Why Chen Duxiu Became a Trotskyist? (Reprint)Tang Di

Theory

29 The Challenge of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i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Rosa Luxemburg.....Paul Le Blanc

English

34 Full Abolition of Nuclear Power to Overcome Social Anxiety.....Po Mi